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5月30日第34期

本期目录

热点研究

金春明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

书海泛舟

徐振保口述 王芳、林升宝采访整理 复旦文革“太史公”徐振保访谈录

吕岱 家事如史——读刘成杰《不忍离去》

陈益南 韩少功纵论文革史的《革命后记》一书出版

阎长贵 生动的回忆 深刻的反思——读《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

故纸堆

石名岗 珍贵的文革历史文献——《论现状》

张耀明 论现状

编读往来

齐晓筠谈 32 期徐友渔专辑

【热点研究】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

金春明

作者简介：金春明，1932年生，1952年从东北局党校高级部毕业后即从事中共党史教研工作。1961年调中共中央党校。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央党校复校时，1977年秋，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指示党史教研室组建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当时的说法是研究文革中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三次路线斗争”），金春明受命担任组长，成为最早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党史学者。后为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

是文化大革命)导师。著有《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与黄裕冲、常惠民合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香港开明书店,1992年)、《“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文化大革命”简史》(与席宣合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金春明自选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四人帮”沉浮录》(九州出版社,2013年),主编有《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另外还发表有《绝不可淡忘文革》《“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两个文革”说与文革的定性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等专题论文。



本文写作于2012年作者八十岁时。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有一个避不开,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亲自发动者和最高领导者;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指挥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名义上是副组长、代组长,实际上是当家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终身最高领袖;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妻子,新中国的首位第一夫人。江青在众多场合高声宣扬“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候,以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无人提出过质疑。而毛泽东对此也长时间处于默然状态,只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才在1974年7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众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可是,连当场亲耳聆听此话的一位政治局委员也不能完全接受,认为总能代表一点吧。毛泽东在世时,江青高升、显赫,号称“文化革命的旗手”,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毛泽东逝世后仅27天,江青即被隔离审查逮捕下狱,成为世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公开审判定罪,处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如此大起大落世所罕见。这真是一种错综复杂而又难解难分的特殊关系。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神秘的作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标记和深刻烙印。

这种特殊关系不仅是中国人研究“文革”史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也是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邓小平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这位女记者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她问:“中国人在讲起‘四

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¹“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²等。而邓小平则明确回答：“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性质是不同的。”³同时又指出：“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⁴邓小平的回答，为澄清一些议论和猜测，提供了关键性的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样的回答，并未能彻底解开人们心中关于毛江关系的种种问题和疑团。不过，邓小平的回答也没有关闭人们探讨毛江关系的大门，而是留下了继续探讨澄清历史真相的很大余地。

一

人的情感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情感更是如此。因此，要搞清楚毛泽东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关系，就必须对他们二人在此之前的情感生活的发生和延续作一简要的回顾。

毛泽东认识江青是在 1937 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江青奔赴延安之后⁵。毛泽东同江青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流传版本颇多，什么“课堂表现说”、“登门请教说”、“康生介绍说”等等。不过毛泽东和江青本人都没有写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这种属于二人感情世界的东西，已无从考查，而且对于我们研究的问题也并不是重要的。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相识、相爱和结婚，并不是由党组织安排和负责介绍的。而且可以说是违抗组织的意志，抗拒舆论的颇大压力而进行的一种自由恋爱式的结合。

对于毛泽东与江青的这段姻缘，当时在延安就议论颇多，成为街谈巷议的一个热点。不仅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大多持不赞同的态度，女同学反应尤为强烈，认为江青不配成为党的领袖的夫人，而且地方党组织亦有专电中央表示不赞成的。例如，当时的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刘晓、刘长胜等，就曾向党中央汇报江青在上海的种种不良表现。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亦曾专电延安反映曾在当时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杨帆（当时名殷杨）对江青的看法。由于反映颇为强烈，以致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洛甫）不得不出面找毛泽东谈话，劝他慎重考虑，但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70 多年后的今天还有革命前辈在自己的

¹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4 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2 页。

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4 页。

⁴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2 页。

⁵ 江青是 1937 年 8 月同其他一些国统区的青年一道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大卡车去的延安。见《红岩春秋》1989 年第 2 期 54 页。

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比如老红军曾志（陶铸的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中，就说：“我当时就十分疑惑，像主席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怎么会与上海滩这位声名狼藉的明星结合呢？她与贺子珍是两路人。”¹而且谈到 1939 年初到陕北见到彭德怀时，还谈到“已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的蓝苹（江青）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传闻。”可是，也有不同的看法。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在 2010 年第 6 期的《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江青的亲情世界》的文章，头一个小标题就是：“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他的回答是：“2007 年 7 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杨银禄认为，江青能够放弃在上海过明星的安逸生活到条件艰苦的延安，说明“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因此，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这里杨银禄同志似乎混淆了一个界限：奔赴延安是一回事，而同毛泽东结婚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事。江青当时是革命的女青年，有条件被毛泽东选择，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选择她做终身伴侣是明智和适宜的。因为，即使是一般人的恋爱结婚，也要考虑对方除政治以外的其他条件。而对领袖的婚姻条件，明显地应该高于一般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于女人，妇德是一个必需考虑的重要条件。我并不赞成“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妇德标准。现代社会主张恋爱自由，女人的贞操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被认为是头等大事；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贞操也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江青当时虽然只有 24 岁，却已结过两次婚，又同别的男人同居过。而且由于同上海艺人丈夫唐纳的婚姻纠纷，在小报上闹得沸沸扬扬，绯闻缠身，名声颇劣。加上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还没有审查清楚。在这一方面，江青同杨开慧、贺子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样一个女人，一般男人选为对象都要思之再三的，何况是要做党的最高领袖的夫人。况且，在当时的延安，毛泽东选夫人可以挑选的对象颇多，是有很大的选择空间的。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个男人，有权利选择自己心爱的女人。不过，情感有时是会蒙蔽理智的。毛泽东在同江青结合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较之他处理军事、政治等国家大事要略逊一筹，并不能认为是很明智的。说是失败的婚姻，可能有点过份，因为也曾经有过爱情和幸福。而且人是会变化的，感情也是会变化的。谁也难以预料几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如果从结果的角度来回顾，作反向的历史考察，那么应该说，毛泽东选择江青做终身伴侣并不是明智而慎思的选择，并不是最佳选择，结果也并不是美满的。

二

¹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 年 8 月 8 日。

从 1937 年秋毛泽东与江青相识，1938 年 11 月两人正式结婚，到 1963 年江青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这 25 年可以概括为两人关系比较平静和协调的时期。江青还做了些好事，没有出大格，当然也会“偶而露峥嵘”。这 25 年可分为两大段：

1937 年秋，蓝苹到达延安并改名江青，一年后同毛泽东结婚，从此开始了她个人生活历程中的与以前截然不同的阶段。到延安后，江青先后在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抗战八年中，除演戏外她几乎很少出头露面，主要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并协助毛工作。在这八年中，二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1939 年曾在毛主席家吃饭的曾志，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江青因怀孕反应，吃饭时呕吐，“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¹当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当连长的高富有也说：“那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²

1947 年转战陕北时，江青任中央纵队直属队的协理员。这段历史是后来被江青本人屡屡提及的个人经历中光辉的一页。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在延安的十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³是否真的这么好，我难以确定。但应该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江与毛的感情虽然也不时发生一些纠葛，就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协调的。

1949 年进北京，是中国共产党变成执政党的历史性大变化，当然也是江青生活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毛泽东以党的主席而又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江青成了名正言顺的新中国第一夫人。随着身分、地位和物质条件的巨大变化，江青“官升脾气长”，性格中卑劣的方面越来越显露而发展了。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江青的脾气越来越大，稍不如意便大发雷霆，很难侍候。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江青的感情世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曾志在前引的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中，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去看望他，都六月份了，主席还穿条破旧的有几个洞洞的毛裤。我问：‘这么热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腿没毛病，只因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那江青不会给你订做吗？’‘我生活上的事她从不关心。’”后来是曾志在广州帮毛主席订制了两套线衣线裤。不过，因为江青生病，还曾因患子宫原位癌，去苏联做过手术和放射性治疗，毛泽东“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到广州时，毛泽东把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自己住较差的三号楼。毛泽东还特别嘱咐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

¹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 年 8 月 8 日。

²转引自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 年第 6 期。

³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 年第 6 期。

从总体上说，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同江青之间的矛盾显著增多。而毛泽东对江青也采取“管半个”的态度。所谓“管半个”，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初，同自己的秘书高智在散步的时候说的。毛泽东说：“江青我只能管半个。”高智说：“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毛回答：“我管不了。我管半个，那半个随她去。”高智接着说：“毛泽东讲的是实话。江青个性强，脾气不好，毛泽东对她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还断不了吵一架。”²

有一位毛主席卫士的话，把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说得很形象。他说：“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³毛泽东建国后一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以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睡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60年代初，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去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病疗养为名，4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几个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疗养区如北戴河等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至于玩不到一起，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而毛泽东对卫士长说的话层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泽东认为：“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当然这个话也可能是毛泽东不高兴时说的，也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从江青的角度说，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这些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还是年方35岁的中年妇女，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21岁的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代表毛江二人关系的全部，而主要是生活中的表面

¹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8日。

²转引自权延赤：《领袖泪》，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³《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47页。

现象。考验夫妻关系的更重要的应是对重大事件的处理。而这方面恰好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当时住在那里研究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其间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江青你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材料交中央组织部，你要好好交待等。江青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是反毛的。毛泽东当即找来公安部长罗瑞卿，指令设专案侦破。这说明毛是信任江青，而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的。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匿名信专案一直到1961年才破案。写信者竟是曾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伯渠的夫人朱明。“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¹

还有一件很能说明那个时候毛泽东同江青关系的事。1960年代初，有一次江青为一件小事而责骂了杭州某宾馆的服务员张素兰。李敏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知道后，带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²毛泽东以伟大领袖的身份，能为江青的事向一个服务员道歉，并说出：“为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这样份量很重的话，说明同江青的关系是好的，是有感情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江青的某些政治观察和分析，还是欣赏的。对她反映的某些情况和问题，还是重视和赞同的。毛泽东有一次去广州，就曾亲口对省委负责人陶铸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³而这一点，也正是江青自己引以为荣的。按她自己的说法：“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⁴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性质吧，在50年代江青公开露面参加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社会活动并不多。影响比较大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她参加了为配合这场批判而进行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由中央文化部、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日报、中共聊城地委和武训当时活动的几个县委的宣传部等共13人组成。其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化名李进的江青。他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访问160多名各界人士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后又印成小册子，产生较大影响。这篇《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吓人的大帽子，说他是“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

¹转引自《中国老年报》，2011年7月6日。

²阎长贵：《在钓鱼台的日子——江青秘书谈江青》，《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³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8日。

⁴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页。

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强加的罪名，已经显示了江青善于用“左”的观点强加人罪的特点。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为，这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对于 50 年代的二人关系，江青曾与延安的老熟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过一段话，颇有一点自我总结的味道。江青说：“想到目前、度日如年。我和毛主席生活不融洽，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是无法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之间，只是政治夫妻而已。”¹“政治夫妻”一词不太好听，但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到了“文革”时期，就发展扩大到了极端。

三

江青在中国政坛上日益活跃起来是 60 年代之初，打出的旗号是搞“文艺革命”。这是借助于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的东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不断发展，用他主观认定的“阶级斗争为纲”去观察和衡量一切，因而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1963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材料上毛泽东写下《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半年后的 1964 年 6 月 27 日，他在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写下一大段《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他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需要“认真改造”。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气候下，江青出场了。她先是准备抓京剧团，以北京为基点搞京剧革命，但没有得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的支持，于是转而去上海。在那里，她得到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的支持。

关于江青是如何举着“文艺革命”的旗号，搞所谓“样板戏”，当时在文化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曾有一段亲身经历的生动描述。

1964 年全国京剧会演时，山东京剧院带来一个剧目《奇袭白虎团》。试演时，江青突然出现在剧场。没过几天，她突然召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周巍峙等到中南海开会。会上，江青趾高气扬地说：“抗美援朝的事，你们不知道，我可都知道。告诉你们那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奇袭白虎团》不过是其中小小一段插曲，你们告诉山东京剧团，很好，一定可以改好。啊，对了，那个带队的什么宣传部长，不就是谭启龙(当时山东省委书记)的老婆吗？告诉她，我支持，但得按我的指示改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又说什么山东省不接受她的意见，妨碍她修改样板戏，那个女宣传部长也被打成

¹朱仲丽：《江青与金丝猴》，《东西南北》杂志，1992 年第 2 期。

反革命，《奇袭白虎团》就成了江青指导创作的样板戏”。¹这位作者是江青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老同学，已经十多年没有看见过江青，她的突出感觉是：“江青变了。”

如果说，江青搞“文艺革命”是借着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的东风，那么，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高压强势的姿态登场，则完全是毛泽东亲自一手策划导演的，而江青也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这集中体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份中共中央文件的炮制和出台的过程中。

江青要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充当急先锋，就需要有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而且还要有一种权威的形式出台，造成一种令人慑服的声势。可是，江青在党和政府中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职务，资历浅、地位低、名声又不太好，不好出台亮相。恰好此时，1966年2月初，北京由彭真出面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²扩大会，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份提纲中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企图把由批判京剧《海瑞罢官》而在全国引发的大批判狂潮限制在上层建筑领域和学术批判的范围之内。这份文件在2月12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各地。批转前，在京中央常委讨论过，彭真等还专门到武汉请示过毛泽东。当时毛并未表示反对。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就把《二月提纲》发至全国。但是，很显然，这是有悖于毛泽东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方向和意图的。《二月提纲》的发出，为江青阐发“左”的文艺理论（当然不只限于文艺）提供了适宜的时机和对立面。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江青去找林彪，以借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和声威来产生一份表达自己观点的文件。江青专门到苏州同林彪作了长谈，二人一拍即合。

江青到苏州找林彪长谈后，林彪马上给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指示，对江青大加赞扬。这个指示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¹张颖：《风雨往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²“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建立的一个领导文化领域里的整顿和斗争的机构。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任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还有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文字不长，但对江青评价非常之高，什么“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的意见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等等。实际上把江青摆在部队文艺工作太上皇的地位。这不只是政治观点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中互相勾结和支持的需要。

根据林彪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出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他们与江青一起开了一次会。从2月2日到20日，18天中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共21部电影)，看戏3次。实际上主要是听江青一个人讲话，别人记录而已。部队同志整理的纪要，江青看了不满意，又专门请了并无军职的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参加，反复修改。最后又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很重视，亲自审阅修改三次，然后才送林彪，建议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从现存的档案材料看，文件的名称中“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几个关键性文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可见，从始至终，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赞成，便没有这份《纪要》。

《纪要》的核心和要点是提出一个十分错误的论断，即：“文艺界在建国以后，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文艺的结合。”因此，《纪要》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些论断很明显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但却是符合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观点，是他的关于文艺的两个错误批示的延伸。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江青是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观点和意图的。

3月19日，江青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表示“根据你的委托”，举行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几经修改已经完成。信中特别强调：“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传达了毛泽东17日的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这个批示反映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关心和重视，不但亲自审阅修改，而且连如何发出的方法都考虑到了。

林彪接到江青信的第三天，就给军委各常委写了一封信，对这份《纪要》大加赞扬，给予极高的评价。信中说：“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修改，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

史意义。”“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文件本身是毛泽东亲自审阅，而且修改三次才定稿的。林彪又作了这样一番高度赞扬和肯定，还会有哪一位军委常委能提出不同意见呢？自然是顺利通过。在用中央军委名义送中共中央之后，4月10日，这份《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到全党。从这个全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场主演者是江青，后台支持是林彪，而全场的总导演则是毛泽东。

四

江青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制造舆论到具体发动，煽风点火，运动群众，制造天下大乱，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而这些当然是遵照毛泽东直接授意和总体意图来施行的。

毛泽东自认为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江青策划组织写出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序幕的。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江青，还是毛泽东都是承认的。据江青说，批判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她先向毛泽东提出的。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支持，但允许她保留意见，她才敢于组织写批判文章的。江青说：“当时彭真拚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¹又说：“1961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²，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³江青这段讲话大体上是比较真实的，这可以从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得到印证。毛泽东说：“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只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⁴这就是说，这篇作为“文化大革命”

¹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2页。

²所谓“有鬼无害论”是由孟超编的昆曲《李慧娘》一戏中出现鬼魂的形象而引起争论中的一种意见。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廖沫沙发表了一篇文章，肯定了这个剧，题目叫《有鬼无害论》。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戏文章赞《李慧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江青在上海组织的批判文章，就是对此而发的。

³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页。

⁴《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7页。

导火线而在全国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引起巨大震动的大批判文章，是江青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打着毛的旗号先搞起来，然后再经过毛的审阅、修改、批准，再公开发表的。在这个问题上夫妻二人的配合是十分紧密而适当的。

毛泽东希望看到的那种亿万群众奋起造反，风起云涌，意气风发，各种群众组织遍地开花，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正是由江青一手操纵的中央文革，千方百计，煽风点火，制造事端，运动群众而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

众所周知，被毛泽东御封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由康生等人授意引发的。而这篇大字报在中央电台的广播和《人民日报》的发表，加上配发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对放开群众手脚，“踢开党委闹革命”，打乱原有的组织机构和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之势，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毛泽东对这点是满意的。他在之后不久说：“时间很短，来势很强，我并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¹

当时的各种各样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多如牛毛，名目繁多。例如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就有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司令部，分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有聂元梓（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所谓五大领袖。上海的工人全市性组织就有“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工人赤卫队两大派。赤卫队被打垮后，站在工总司一边的还有几十个组织。在著名的《紧急通告》（1967年1月8日）上签名的群众组织就有32个之多。武汉“7·20事件”时的两大派，一派叫“百万雄师”，一派叫“三钢”、“三新”，其实大派下边的群众组织更是名目繁多，不计其数。有的组织可以多至成千上万人，也有只一二十个人的小战斗队，在那里“傲霜雪”、“丛中笑”。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两大派，一个叫“九一五”，一个叫“九一六”，在北京也很有名。中共中央党校人数不算多，只有千余教职员，也有四大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红色战斗团和革命串连会，也有其他战斗队。而一些著名的群众组织的头子，都通过各种方式同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取得联系，获取支持，以所谓“通天”本事，作为造反的最大资本，争当“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打着坚决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旗号，挥舞着林彪创造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大棒，煽动利用群众组织，上骗毛泽东，下谋个人私利，甚至假群众之名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下边我们就举几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实例：

江青一伙为了在社会上制造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舆论，由张春桥出面，1966

¹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7页。

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秘密接见清华“井冈山兵团司令”蒯大富。奉了这道密旨，蒯大富连夜八方联络，组织力量，在12月25日纠集了上万人的队伍，在首都举行大游行，在长安街上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一直贴到天安门城楼上。蒯大富还在广播车上带头高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喊出这样的口号，迅速传播四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也就是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的这一天，12月18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控制下，成立了名为审查王光美，实为迫害刘少奇的专案组。这是利用群众名义为阴谋服务的一个突出的事例。

再如，江青一伙为了在上海夺权造声势，就利用“新北大公社”聂元梓，这位被毛泽东称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炮制者的名声，派她去上海造反。上海本来是江青一伙的根据地，但自从柯庆施病死，换上陈丕显任市委第一书记之后，就不那么听江青指挥了。因此，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夺上海的权。1966年11月17日，江青接见聂元梓，对她说：“上海的运动开展得不错，但主要是工人，学生却很落后。你去了要找学生组织多接触。上海市委问题严重，问题没揭透。张春桥在上海一直同他们斗争，但是很孤立”¹等等。聂元梓奉命，带领手下的干将孙蓬一等人立即赶赴上海。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同上海市委有什么关系呢？总得找点理由。这个理由也不难找。因为上海市委常委、文教部部长常溪萍曾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担任过工作队的副队长（队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于是很方便地被戴上“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等帽子。这样，北大造反派到上海揪斗常溪萍也就名正言顺了。于是，常溪萍也就逃脱不了被迫害致死的命运了。

当然，聂元梓到上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揪斗常溪萍。正如聂元梓同张春桥共同拟定的策略：“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打倒上海市委。”于是，聂元梓同11月9日新成立的“上海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相联合，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批斗会。聂元梓在大会讲话中，坚决要求罢免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改组上海市委。聂元梓等人在上海大闹大折腾一番，为江青等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制造了声势，作了贡献。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刘少奇。对于这个“敌人”的斗争，是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写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而揭开帷幕的。但帮忙把刘少奇彻底打倒，以至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的是江青。

“文化大革命”中的头号大冤案，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最后被迫害致死。刘

¹ 《乱世狂女》，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284页。

少奇冤案，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一家人，而是作为一条路线、一个“司令部”的代表，牵涉和株连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党员和干部。在十年中，仅因受刘少奇案株连而被判刑的人，全国多达 28,000 人，受批斗和迫害的人多得难以计算。无论从地位之高，牵涉面之广，株连人数之多等哪个方面看，这个大冤案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造成这场大冤案的责任，当然首先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他负有难辞其咎的领导责任。但与林彪、“四人帮”的责任，性质上是有原则区别的。林彪与江青一伙是共谋犯，罪责难逃，但对造成冤案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却是江青、康生和谢富治。他们利用党和毛泽东的错误，利用掌握的专案组的权力，大搞阴谋诡计，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不择手段地罗织罪名、制造伪证、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欺上瞒下、刑讯逼供，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大量的，世所罕见的。

关于这一冤案的详情，曾参加两案审判的前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将军曾写了一本书，名为《共和国最大冤案》，近 25 万字，翔实可靠。我这里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胡耀邦在 1980 年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曾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这批人确实很坏，是一批骗子、恶棍、阴谋家。除林彪外，其他那些人在党内从来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搞阴谋诡计，手段倒是高明的，别的本事却没有。他们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把一些人的狂热情绪煽动起来，用最巧妙的方法把毛主席封锁起来，欺骗毛主席。比如说，好多人写材料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他们却有办法使毛主席看不到这些材料。到 1967 年秋，毛主席还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林彪、‘四人帮’造了好多假材料往毛主席那里送。1966 年 8 月 5 日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只提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把刘看作是叛徒。把刘少奇看作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当然这是错误的，毛主席要负责任。但把刘少奇看作是叛徒，则是林彪、‘四人帮’造的假材料骗了毛主席。类似这样的冤假错案都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出来的。”¹应该说，这个谈话是客观的准确的。

在陷害刘少奇这件事情上，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是得逞了的。无怪乎林彪知道毛泽东批准了专案组关于刘少奇的诬陷报告之后十分高兴，特别批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这当年留下的两个阴谋集团狼狈为奸、互相吹捧之词，今日却成了江青指挥炮制共和国最大冤案的铁证。

总结以上情况，在打倒刘少奇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江青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在对刘少奇问题的定性上、程度上，打倒的方法上，毛泽东同江青又是有差别的，不完全一致的。从结果上说，毛泽东不管是受骗也好，自愿或不完全自愿也

¹ 《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76 页。

好，最后是信任了江青，同意了江青一伙炮制的审查报告，最终铸成了最大的冤案。

这里必须特别提到一点，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第一阶段，江青对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方针是忠实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热情甚高，日夜操劳。据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说：建国后，江青除了四次出国去苏联治病和疗养外，在国内也很少长住北京。“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是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反正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但唯独 1967 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¹。江青为什么一改多年的生活习惯，一句话，就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方针，表示她对毛泽东的尊崇和忠诚。

五

而在这一阶段中，能突出表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系和态度的有两件事：

一是亲自提名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根据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销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内容如下：

组 长：陈伯达

顾 问：康 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 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这后确定的四大区参加成员是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这就是在 1966 年到 1969 年天下大乱年代里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过其成员变动很大。这 17 人（如果加上后来任命的顾问陶铸，则是 18 人）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排挤出中央文革之外。到 1969 年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只剩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等 5 个人了。

这里不谈中央文革的作用和变化，而只谈能说明江青特殊地位的两件事：

¹阎长贵：《在钓鱼台的日子——江青秘书谈江青》，《同舟共进》2009 年第 7 期。

一件是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据曾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关锋、穆欣等的回忆材料，开始的名单上并没有姚文元，是江青提议把他加上。当时陈伯达曾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情况，怕叫叛徒的儿子参加中央文革会被别人抓辫子。江青这时就抬出了毛主席，说是要请示一下，请毛主席定。当然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第二天，江青宣布，她已经请示过毛主席，主席同意了。关键时抬出毛主席，这是江青的最大也是最厉害的王牌。

另一件是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本来这个小组中就是由江青说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分而任意行事，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她有了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的名义，更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央文革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线总指挥。不过，这也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文革实际上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现实。这件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对江青还是很信任的。

还有一件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这并非是夫妻之间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泽东曾自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对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其对象、方针、任务、目标等等问题，他本人从未曾向党的组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人作过系统而明确的说明。唯一可以较准确地体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就是这封亲笔信。信中讲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的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讲了他自己“准备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也谈到他对林彪的一些看法。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最高一级绝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意图，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一个在党和国家最高机构中并没有任何职务，连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可见毛泽东认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当然这封信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并告诉了林彪。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泽东认为领导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客观地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第一阶段，即从1965年到1969年党的九大这4年多的时间里，也确实是毛泽东同江青关系比较亲密、和谐，矛盾较少的时期。是在入城以后，毛泽东同江青关系最好的一段。

六

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江青已经分居了吗？怎么又能说是“关系最好的一段”呢？看似矛盾，但认真细致地分析一下，也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述，是“1966年9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¹

分居，这对于以永结同好、白头偕老的婚姻来说，当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不过分居也有完全不同的原因和情况。概而言之，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使然。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包括一些高级的革命领导人也难免夫妻离多聚少，甚至孩子出生几岁还没有见到爸爸。而在建国后的和平时期，这种情况也依然存在。比如夫妻双方不在一地一部门工作，不得不两地分居。特别是像“两弹一星”的元勋们，都曾夫妻分居多年。当然这种现象由于各方的努力，已在减少。

一种是由于身体状况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性生活的减退，导致分床而居，分室而住。这在超过七十岁的老年人中是并不罕见的。这也算作一种分居现象吧。

还有一种就是由于情感的变化而导致的夫妻关系恶化，不仅不可能再同床共枕，而且连见面都感到嫌恶，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不能公开离婚，只好分居。结果可能由于一段分离，促使双方冷静反思，重归于好；但更多地则不过是走向关系最终破裂而离婚的一个过渡。

那么，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属于那一种呢？我认为，1966年9月开始分居时，属于第二种情况居多；而进入七十年代，则第三种情况逐渐成为主流。理由如下：

当年毛泽东已经73岁，又面临“天下大乱”，事件繁多的局面，身边又有众多的人员服务，不太需要一位妻子的照顾，乐得身边少一位爱挑剔的女人。江青虽然当年只有52岁，但由于出身和经历使然，同毛泽东在生活上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大，个人欲望迅速膨胀，毛泽东的那种朴质的农民式的种种生活和饮食习惯，使她越来越难以忍受。遇到原来住房要维护装修而不得不搬出的机会，江青自然不愿去毛泽东选择的比较简朴住所中南海游泳池，而是选择了住房和服务更好得多的当时全国一流水平的国宾馆钓鱼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两地相距不远，乘汽车往返又很方便，可以常来常往。这恐怕就是1966年9月两人开始分居时的情况。

不过，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并非始终如一，不仅是两人间的情感因素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个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大体上是在九大以后，特别是“9·13”林彪事件之后。江青在党的

¹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3页。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进入政治局，达到在党内位置的高点。但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文革”这个有权的实体机构却被取消了。江青获得了高位，但却失掉了实权。她又没有分管的方面和部门，按她自己的说法，成了一个“闲人”。一个曾经历过了几年众星捧月，呼风唤雨，大权在握，气焰盖世的人，让她再回到看几本“参考消息”，研究点文化动态和国际形势的坐冷板凳的秘书生活，那是很难忍受的。而这时，由于关心重点的转移，她选送给毛泽东的一些文件和资料，也不再受到重视。江青明显地感到她被毛泽东冷落了。因此找岔子发火也是自然的。

据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说：“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送他的材料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回来了。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1969年10月，全国搞战备疏散，江青搬到北京西山。一天下令把放到钓鱼台10号楼里给毛主席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西山来烧掉。江青说：“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了。”¹

不愿看江青送的材料只是开始，以后就更严重了，限制江青回家，面都不愿见了。大概是“9·13”事件以后，毛泽东就不愿意见江青了。中办主任汪东兴打电话，叫杨银禄通知江青，说毛主席“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当江青听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大发脾气。江青说：“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指示。”于是，江青就没有事先请示同意就去看望毛主席，结果吃了闭门羹。杨银禄对此事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车挡住……江青气呼呼地从车上走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江青两眼瞪圆，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样？你还敢还手？！’……

¹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¹

一个女人如果要见结婚多年的丈夫，都要被挡驾，难以见到，有家难归，这样的夫妻关系真的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十分可悲的了。这样的分居也就离最后的绝裂不远了。据说，毛泽东曾经考虑过同江青离婚，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是很难实现的。据说毛泽东也有过“分道扬镳”的批示，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为事实。

七

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日益恶化，原因相当复杂，既有一般夫妻之间的“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又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上的不同判断和分歧。可以说是生活琐事与党国大事的交织。其中占主导方面的是政治，而非个人的感情，这大概正是所谓“政治夫妻”的一个显著特点。

所谓生活琐事的矛盾，例如，毛泽东吃饭不讲究，爱吃红烧肉，江青说毛是“土包子”，惹毛发脾气说：“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²例如，江青同卫士们打扑克，只能她赢不能输，输了就同卫士吵架，闹得要毛泽东出面调解。例如，参加舞会，江青又挑乐队，又吵灯光，说三道四，闹得大家很紧张，毛泽东也不愉快。如此等等。按照一位卫士的说法，那时的毛江关系叫“有恩爱也有争吵”³。

在这个时间段中比较严重的一次，是因为1972年毛泽东的一场大病，引发江青的歇斯底里，竟指责医生和护士是“特务”，要暗害毛主席，引发毛泽东的严厉指责。请看负责毛泽东工作和警卫的中办副主任张耀祠的下述回忆：

1972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讨毛泽东的病情。江青在这个会上“恶狠狠地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要立专案审查。……”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如实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对江青憋了一肚子气。

“一天，周恩来、江青、汪东兴来看主席。主席是了解身边工作人员的，他当着周总理、汪东兴的面，用他那硕大的手，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特务’，

¹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²《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40页。

³《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1页。

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一席话，说得江青垂下头来……”¹

自己的丈夫生大病，休克，甚至一度“摸不着脉”，这对任何一位妻子都是非常严重的大事。着急、上火、发脾气，都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情总要有个合理的限度，随意怀疑医生、护士是“特务”、“反革命”，要设立专案，致人于死命，江青这样的作为就是邪恶而不可理喻的了。何况江青身为伟大领袖的妻子，受人敬重的最高层领导人，如此作为，难怪毛泽东要生气，甚至厌恶，而不愿见她了。

类似的事情当然会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产生影响，但不应是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二人关系恶化的核心原因还在政治上。如果说上一阶段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完全一致，江青的很多活动和做法体现了毛泽东意图的话，那么这时，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已经不完全一致，出现了相当深的裂痕。当然，从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维护方面看，毛泽东和江青是一致的，在这点上可以说是“十年一贯制”。这也是毛泽东支持江青搞“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但在具体做法和要求获得的成果方面看，毛泽东同江青又是不一致的。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了，可以从“天下大乱”向“天下大治”转化了。可是江青并不愿意，还要不时地制造各种事端，让中国再乱下去。毛泽东主张“以安定团结为好”，江青却不认为好。特别是，江青认为自己帮助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天下大乱”，打倒刘少奇，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当得到毛泽东的论功行赏，享有应得的权力和地位。可是，她得到的仅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虚位，没有分管的领域和部门，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职权。她想让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自己控制党中央的领导权，但都没有做到。所以，她多次向毛泽东抱怨，自己在九大以后基本是“闲人”。在毛泽东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由张春桥提出要安排江青的职务问题。

可见，这种掌握大权的强烈的主观野心成为支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切行动的主线。

正因为如此，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些意图和做法，就不再那么刻意领会和细心配合，甚至有时会公开站出来反对。在对待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就表现得特别尖锐。例如：

江青一伙阻挠邓小平复出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

¹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34页。

交部长陈毅的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提到邓小平与刘少奇的问题性质有区别，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授意把毛泽东这个意思传递了出去。邓小平在得知林彪事件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作了适当的自我批评。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来信作了批示，明确表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¹

毛泽东的批示，话讲得非常明确。而这个时候强调邓小平的优点，为他评功摆好，绝不止是林彪事件后对老战友们的怀念，而是一种富有深意的政治表态。周恩来立即抓紧时机，为邓小平复出作多方努力，但受到江青一伙的反复阻挠。不过毛泽东已作了批示，江青一伙也难以长期阻挠。一直到毛泽东批示下达一年之后，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终于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经过周恩来的精心安排，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为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而举行的宴会上，引起国内外的轰动。

江青一伙反对邓小平率代表团去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

1974年，联合国要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派谁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团长呢？中央政治局为此曾专门开会研究。有的同志提议由邓小平领队，这从当时的工作安排情况看，也是适合的。因为按一般国际惯例，出席这种大会的代表团长应高于外交部长。但周总理已患重病，不宜出国远行。那么理所当然的应是负责外事工作的副总理。因此，毛泽东选定由邓小平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可是，江青却顽固地反对邓小平率团出国。3月22日，外交部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2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当夜，江青就把王海容叫来，对外交部无端指责，强令收回报告，重新考虑人选。遭拒绝后，26日，江青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中央政治局意见不一致，只好请毛泽东裁决。1974年3月27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江青，信中说：“邓小平同志去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²这样，江青才停止无理取闹。4月份邓小平率团出席了联合国特别会议，并在这个世界性的讲坛上，精辟地阐述了我国对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指导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¹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1页。

²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9页。

江青一伙制造“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内围攻邓小平。

“风庆轮”是一艘我国自己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三十多年前，中国的造船工业还不甚发达，因此，能制造出万吨级的远洋货轮还是一件大事，也是可喜的成就。不过也还有些机件不能完全过关，特别是大马力主机。因此，在出航的时间上曾有所推迟，引起了一些矛盾。为了保障海上航行的安全，交通部还特别选派了一位有20多年远洋航行经验的干部，名叫李国堂，到船上担任副政委。这本是一番好意，张春桥等人却很恼火。“风庆轮”的第一次远航是给罗马尼亚运送去万吨大米。1974年5月4日从上海起航，经西太平洋、印度洋，又绕行风大浪高的好望角，经地中海，航行两个多月终于到达黑海的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丁。1974年9月30日，国庆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历时150天，航行3.2万海里。这在当时的中国远洋航行史上也算是值得一书的成绩。可是“四人帮”一伙却把它拿来作为攻击周恩来等领导的国务院，打击邓小平的一枚炸弹。在报刊上大肆宣扬“风庆轮”“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的同时，“四人帮”下令扣押交通部派到船上的李国堂副政委进行批斗，同时指使爪牙写了一份所谓航行中问题的内部《动态》上报中央。

在做了这些手脚之后，“四人帮”就倾巢出动大举进攻了。10月14日，江青在这份内部《动态》上气势汹汹地作了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交通部却被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态度。”张春桥马上响应并上纲到两条路线的高度，张春桥批示说：“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轮’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善于打棍子的姚文元当然不甘落后，也紧跟着批判了一大段：“基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抗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其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这些帽子不可谓不大，完全可以置人于死地。王洪文上纲上线不如张、姚，但整人的办法却很多，他下令：“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揭发批判，然后再送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

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一天，在同一个问题上作了如此严重而尖锐的批示，是很不寻常的。批示名义上是对着李国堂和他所在单位交通部，但李国堂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值得四位“大人物”如此重视吗？很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谜底三天以后就见分晓了。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江青借机发难，拿出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当面质问邓小平为什么不批示，不表态？邓小平严正地回答：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我要调查，我要调查。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忍无可忍立即予以激烈反驳：每次政治局会上都是这个态度，你这样搞，政治局还能合作吗？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在这样气氛下当然难以冷静地研究任何问题，邓小平起身离开了会场。张春桥马上乘机挑唆：“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江青也大叫：这“不是对我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复出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冲突，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江青一伙谋告“御状”，阻碍邓小平组阁。

会后，江青立即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她住的地方——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开会。一个政治局委员通知副主席和常委到自己家里开会，这本身就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不正常的。据王洪文和姚文元后来的交代材料，在这个小会上，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而是搞串联。总理、小平、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与四届人大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邓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是‘二月逆流’。”王洪文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则说：“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不对，难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问题。过去邓小平很少讲话，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实在意外。”经过整夜密谋后，他们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主席报告。于是第二天，10月18日下午，王洪文就飞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了。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向主席报告工作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问题是这位副主席不是代表政治局，而是避开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避开其他副主席和常委，只代表四个人，就使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了损害。

这次告状的情况，据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给特别法庭写的证词里面谈到的是这样：

王洪文开始时礼仪性地询问了毛主席的健康情况之后便开始告状。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主席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洪文向毛主席汇报了围绕“风庆轮”问题发生争吵的经过，污蔑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接着王洪文又污蔑攻击周恩来等有密谋。他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

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往来这样频繁，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在汇报中，王洪文也没有忘记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分别作了一些吹捧。

毛泽东没有听信王洪文的汇报，反而告诫他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样搞不好。”使“四人帮”告状的阴谋未能得逞。王洪文虽然当面承诺回京后一定要找总理谈，按主席的指示办，但回到北京还是先到钓鱼台找江青等人汇报并商讨对策。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后，对陪同外宾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又给江青等借“风庆轮事件”掀起政治风波的阴谋，当头泼了一盆冷水。11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接见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到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事，两人作了生动的对话：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奉命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和人事安排问题。先后谈四次。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就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了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王洪文满面羞红地承诺：“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还按毛泽东的要求，写了书面检查，但回到北京后一切照旧。

毛泽东肯定并赞扬了邓小平，说：“他政治思想强。”指着王洪文说：“邓比他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又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得”。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在党的十大上选择王洪文当接班人的决策，已经丧失了对王洪文的信任，而把党、政府和解放军领导工作的重担放在邓小平的肩上。邓小平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过：“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主席笑着说：“没有办法呢。”

毛泽东还当周恩来和王洪文的面谈了他对江青的看法。毛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不过，毛泽东认为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

误，就不对了”。“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后面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又不告诉我。”说明他对江青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并没有把江青看作是敌对的力量。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长沙谈话的要点，并得到到会人员的一致同意。江青等人也不敢在会议上公开反对。根据会议的决定，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批准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他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并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员，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以邓小平为首的12位副总理。江青提议的王洪文当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意见被否决了。说明，毛泽东虽然仍然信任江青，也没有割断夫妻之情，但在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人事安排上，还是原则第一的，是理智的。不会因亲情而干扰破坏原则。

不过，即使是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江青也不是全部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对着干的。同毛泽东也有一致的地方。比如在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涉及否定“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不愿主持起草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的时候，江青就成为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煽风点火者，而大肆活动起来。这说明，江青把邓小平视为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对毛泽东支持重用邓小平的决策就反对，不满；而当毛对邓失去信任再打倒时，江青同毛泽东又一致了。这也是毛江二人关系中复杂的一面。

八

总括上述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对毛泽东与江青“文革”时期的关系，可以得出三点认识：

（一）毛泽东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政治关系是好的。从始至终政治大方向是一致的，共同坚持发动、坚持和维护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决策者，最高领导人；江青是忠实执行者，具体指挥者。

从具体执行的过程的结果的角度看，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江青忠实而有创造性地完满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例如：炮制揭开“文

革”序幕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同林彪合伙炮制否定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的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等。

二是，江青基本上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但在执行中又夹带了个人私货。例如，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决策，《报告》最后也由毛泽东审阅批准，但其中的不少伪证，却是由江青指挥专案组用各种残酷非法手段伪造的。再如，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所谓对美外交中的“错误”。江青说，对周的批判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既肯定“这次会开得很好”，又批评江青“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¹又如，1974年搞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动的。不过擅自增加了批“走后门”的内容，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开展，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²等。

三是，江青自作主张，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志，但最终经毛出面批评后还是服从于毛。例如，1974年3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代表大会问题，江青就激烈反对，甚至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外交部。一直到毛泽东亲笔写信警告，才被迫停止无理取闹。又如，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重组国务院的问题上，江青千方百计为争取自己一伙“组阁”而大肆活动。毛泽东明确批示：“不要由你组阁”³，还不肯罢休，一直到独自飞往长沙去见毛泽东，所提要求遭到拒绝，才不得不勉强接受四届人大的组阁方案。

过去常说，“江青背着毛主席干许多坏事。”“背着干”的坏事当然也是有的，而且相当多。但比较而言，江青遵照毛泽东指示干的事，要比“背着干”的多。在“文革”前期，在涉及全局的政治问题上，江青都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而在涉及自身命运的利害的问题上，特别是“文革”后期，江青对毛泽东的批示有所违抗，但绝不是反叛式的根本背离。此所谓二人之政治大方向始终一致，也是江青所谓“政治夫妻”之核心和基础。至于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犯下大罪，那已不属于本文论述的二人关系范围之内了。

（二）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十年中的感情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关系，旁观者只能推测，而难以断定。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这是长期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的伟大领袖的“家务事”，更是难予说个清楚明白。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就“分居”的起因观察，并非感情恶化或破裂，而是始于住房修缮，江青不满意毛泽东选择的中南

¹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页。

²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6页。

³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8页。

海游泳池，而选择了条件更好的钓鱼台国宾馆。分居之后，江青还是经常回中南海的家中，同毛泽东也经常见面。一直到1972年，毛泽东下了江青回家必须事先请示批准的命令，情况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但此后也一直还有千丝万缕的关连，还维持着夫妻关系的局面。重大场合二人共上主席台，外人看不出什么破绽。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是一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才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同江青分居这个大新闻。“分居”在夫妻生活中当然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但就已知的毛泽东同江青分居的具体情况看，似不足以成为解脱毛泽东与江青所干坏事关系的根本理由。

（三）毛泽东与江青之间还是有感情的，亲情的纽带始终没有彻底切断过。毛泽东一直到生命终结之前，始终还是挂念江青的。

1974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点名批评江青搞“四人小宗派”。但同时又说：“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¹1975年1月，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述了江青对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看法。毛泽东很担心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²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还有一件很能说明二人关系的事，就是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最后一次生日的情况。据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记载：“临近中午，与毛泽东分居已久的夫人江青也来了。这些年来，江青已很难见到毛泽东。特别是半年前，毛泽东还特意吩咐：‘没有我的同意，不许打开铁门！’毛泽东所说的铁门是指其住宅外面的最后一道大门，据说，毛泽东这一命令便是专门针对江青的。但今天毛泽东生日，江青还是进了铁门。江青来时特意带了两道菜：胖头鱼汤、肉丝炒辣椒。这是毛泽东很爱吃的两道菜，是江青在钓鱼台她的居所做好后带来的。生日宴上，菜肴比往常丰盛。毛泽东喝了胖头鱼汤，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并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这顿饭，毛泽东吃得比平常高兴……”

而江青对毛泽东，也绝不是像有人在书中说的：“毛泽东主席去世，江青毫无悲痛，竟未流一滴眼泪。”³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在《江青的亲情世界》一文中，引述姚文元亲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⁴这个情况应该是可信的。

¹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4页。

²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7页。

³ 《北京青年报》，2011年9月13日。

⁴ 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总之，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期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值得研究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不要把这种关系完全政治化，一方面，不能为了维护伟大领袖，而把一切脏水都泼向江青；另一方面，更不应把江青干的一切坏事都算在毛泽东的账上，甚至说成是“五人帮”。需要的是从真实的具体史料出发，多做科学分析，而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也许这只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观愿望。不妥之处，深望得到批评、指正。

【书海泛舟】

复旦文革“太史公”徐振保访谈录

徐振保 口述

王芳、林升宝 采访整理

按：本篇选自徐振保编《复旦大学大字报选》，此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项目《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中的第二套（上、下册），全套资料汇编由金光耀、金大陆主编。已经编印的第一套是金光耀整理的《叶昌明工作笔记》，按计划正在进行的还有金大陆、吴健熙编《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金大陆编《上海红卫兵大串联史料选》、徐振保编《复旦大学“文革”大事记》等。

整理者按：徐振保，1943年生，安徽徽州人。复旦大学1962级历史系学生，上海市中学高级教师，园丁奖得主，上海市教科研先进个人，上海市钱币学会会员。还喜好收藏生产、生活用具。著有《中外文化交流记趣》《中国茶文化漫谈》《中国节日大观》。本次采访时间为2012年7月26日下午，地点即徐振保家中。

历史眼光：萌发保存复旦文革资料之志

我是1968年从复旦毕业，被分到上海教育局，后来到江苏省溧阳县河口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干了两年，1970年回上海，被分到嘉定来教书，2003年退休，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1966年时，我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当时复旦是五年制的。

我是学历史的，复旦给了我历史眼光。因此，我既关心历史又关心政治，因为现在的政治就是将来的历史。我曾想了解1949年后的那些政治运动，比如说土改，要查找资料，能查到什么呢？！除了官方的文件以外，其他的资料，就找

不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缺陷。后来我知道，延安时代，就有外国人随工作队下到村里面去，他当时的详尽记录和调查就非常有历史价值了，能从一个点来反映农村土改的过程。西方人研究历史，有个传统，就是注重微观，而我们中国缺少这种东西。我读书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促使我想到，保存重大政治运动中某个点上的资料，绝对是件有意义的工作。

1966年5月31日，我回到复旦。之前我在横沙岛搞“四清”运动。6月1日，全国的“文革”之火烧起来了。我当时就有一点小小的敏感，觉得这可能是对中国将来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运动。因此，我决定做收集保存基层运动资料的工作。我庆幸我是复旦学生，因为复旦是上海最有影响的学校，复旦运动是当时市委重点抓的“点”。它势必会对整个上海市的文革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收集保存复旦文革资料就更有意义了。当时我很清楚，这将是一项枯燥的工作，要做好它，那不是花一点点时间的事。我这个人没有特大的聪明，历史眼光还是有点的。我认准的事，能坚持做，做好它。在他人看来这是件成功机率很小的事，我却认准一定能成功。

我是普通学生，高层的事情我不可能参与，我只能记录面上的东西。但面上的东西很重要，它往往是深层次的东西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我能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记录每天的动态和大字报，重要的大字报，我都一字不漏地给抄下来，蛮辛苦的。谭启泰、欧阳靖的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有万余字。我当时根据自己的眼光判断，对大字报是有取舍的，反映运动走向的大字报，比如运动之初批陈传纲（文革前复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的要保存；反映造反派与保皇派论战的大字报要保存；上海市长曹荻秋在复旦的讲话更要保存。

“退隐江湖”：编选工作得到复旦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

1966年8月18号，毛主席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晚上8点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件事。复旦外文系的孙月珠登上天安门城楼，马上给学校里那些主张造反的人发电报，复旦持造反观点的人受到莫大的鼓舞。

我当时已经上床睡觉了，被同学给拉起来。我们就到草坪上去，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写出历史系最早的造反大字报，并给毛主席发去致敬电，说我们听从您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后来，复旦造反派中有个出名的组织，叫“前卫兵团”，主要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我的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就是在小镇开个小店，另有几亩土地出租。1956年合作商店的时候，我家小店的资本才108元。我有个南京籍同学，姓郭，跟我的出身相类似。我们俩都是班上的政治小组长，政治小组长就是开会时的召集人，指导员有什么任务布置

给我们，我们就组织小组成员学习。我和郭与班干部（也是系里的学生干部，保守派骨干）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我们造反后，班干部马上找我俩谈话，说起反右斗争。当时学校正在放反右的电影，杨西光这个人还是很有头脑的，放这个电影就是给学生一个警告。班干部要我们公开宣布退出造反派，想借此给造反派一个打击。我们最后作出的决定是不参加造反派的活动，也不写退出说明，静悄悄的，使双方都能够接受。这件事对我有一个好处，我就能够全身心地抄我的大字报，收集资料了。

我关注复旦每天的运动，有时也离开复旦。如9月份到北京大串连，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接见。那时，大家充满政治热情，没想过去爬长城，而是到北大、清华、团中央等处看大字报。我因惦记着复旦的文革状况，在北京待了五天，就回复旦了。

我是安徽人，我中学的同学到复旦串连，一次一次地邀请我到合肥去串连，盛情难却，我也想去外面跑跑。因为关注的还是复旦文革的动向，去了三天我就回校了。11月初，复旦党委以“三秋”劳动（秋收、秋耕、秋种）为借口，把学生赶下乡，希望借此给复旦文革降降温。这期间，复旦造反派在团委前静坐，接着又发生“11·8”抢黑材料事件，我未亲见，是个大遗憾。不过，我离校期间曾关照要好的同学把复旦的文革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记录，以保证记录的完整性。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造反派的日子就好过了。造反派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保皇阵线开始瓦解。在这个形势之下，我有个行动。我想我的工作如果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开展起来会更顺利，而保皇派是不可能支持的，因为我是在私家修史，何况我持造反立场。我相信造反派会支持我，因为我记录他们的足迹，为他们存史。1966年11月底，我就在复旦的大字报栏（即所谓的“南京路”），贴出倡议建立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征集小组的大字报，希望做保存资料的工作。各造反组织果然支持，一些同学报名参加。最初的征集小组有十来个人。资料收集整理是件耗时、难见成果的工作，喜欢冲冲杀杀的人坐不了冷板凳，离去了。这个小组只剩下我这个“光杆司令”，我坚持下来了。

3月初，学校著名的造反组织红革会（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三司（红卫兵上海市第三司令部）、东方红公社掌权了。他们将10号楼（文革前是留学生宿舍）的一间拨给我，作为我收藏资料和办公的地方。此外，还向我提供文具、纸头、油印设备。没有造反派的支持，复旦文革资料是不可能得到油印出版的。

五种资料：“复旦文革资料征集小组”之成果

到了1967年3月，我就想，总要拿出一些成果，让人家觉得你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有一个观点，你不要要求人家怎么样，不要抱怨这个不公那个不公。你把工作真正做好了，拿出成果，人家自然会尊重你。我想我能够拿出什么成果呢？我觉得我第一样能够拿出的是《大字报选》。因此，我就把1966年6月文革开始到1967年3月份的复旦大字报，编了一个目录，有影响且能反映复旦文革动态的均被囊括在内，不仅选录了造反派的大字报，也收入保守派如“红缨枪”的大字报。我不知道这个目录是否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就把它贴在复旦的“南京路”进行公示，请大家评论。想不到得到大家的认可，支持的呼声极高。我想这是我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立场决定的，因为我不偏袒任何组织和个人，唯真求实，同时注意到全面多角度地反映历史面貌。1968年5月，复旦文革大字报选第一辑内部出版散发，署名“史红战斗组”。其实，这组仅我一人。起“史红”之名有点赶时髦，意为记录红色历史。我的同学顾晓鸣还专门为我刻了一方“史红战斗组”的图章。

继大字报之后，我想编写《复旦文革大事记》，为后人留下基本线索。因为我每天都有记录，编写没什么难度。难的是怎样记述，我想起孔子作《春秋》，写鲁国编年史，他记事不评说，高明的是褒贬在其中。我也尝试这样写，水平如何，就让读者评说了。

又过了几个月，我又编了新的大字报选辑。我决定把编写资料的截止时间定在1968年1月25日，也即复旦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到这个时候大字报选编了三辑。

复旦文革的重大事件，大字报选、大事记中只有点滴反映，无法令人了解来龙去脉。怎么办呢？我想起历史体裁中的纪事本末体，我决定利用这一体例反映复旦文革重大事件，编写《名词解释》，如“8·25”大串连、“11·8”抢黑材料、“1·28”炮打张春桥，介绍事件的始末。复旦文革中产生的一些特殊名词，如“南京路”，后人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应作一介绍。《名词解释》于1968年4月编就，119条，近10万字。

文革中，各级党政组织机关受冲击，毛主席对文革的领导，主要通过电台报刊实施，“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的社论文章成为文革指挥棒。无论当权派还是保守派、造反派，都通过研读“两报一刊”上的社论文章，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若把复旦文革置于上海乃至全国的大背景中考察，我认为有必要编一份左右文革大局的报刊社论文章的索引。于是，1968年7月油印出版了《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命有关报刊重要社论、报道、文章篇目索引》。

毛主席的重要讲话，那是“文革”的灵魂，是各派千方百计要了解的信息。他的有些指示会在“两报一刊”上用黑体字标出来，一些关于地方的指示，中央的报刊不一定登，而会登在各地群众组织的小报上，比如关于青海的指示，小报上就有。这些是了解“文革”走向的重要途径。我认为没有人会吃了豹子胆敢来伪造“最高指示”。因此，我就尽可能地收集在小报上刊登的毛主席对于各地的“最高指示”，连同“两报一刊”上公开发表的“最高指示”，合编起来，于1968年7月油印出版，标题为《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一：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记录了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讲话到1968年7月发表的“最高指示”，计11.3万字。

以上我编的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共五部分：毛主席重要指示，报刊重要社论、报道、文章篇目索引，大字报选，大事记，名词解释。这些资料的刻印工作，全由我承担。在毕业前，要完成收尾工作，尤其是大事记的刻印，靠我一个人，恐怕来不及了。我就向学校的造反派“求援”，希望派一些老教授来帮忙刻写，他们同意了。因此，一些能刻写的教授就到我这里来“服务”了。他们也蛮开心的，因为不用扫厕所，也不用挨学生的批斗了，对他们是种“解脱”。每天到我这里，安安静静的，能刻多少算多少，没人打扰他们。其中刻得最好的是历史系的吴杰教授。你不用担心他们会刻错，起初还检查检查，后来就“免检”了。就这样，大事记的刻写工作如期完成了。

1968年7月，我要离开学校了。五种资料的编印工作，最终在我离校前按期完成。不得不提的是，有一些同学帮了我的忙。比如封面就是我的一个刘姓同学设计的，他美术字写得好。我那个南京籍的郭同学也帮忙刻了一些，我有时还请他看看资料，提意见。上海的姜同学还住进了我的工作室，我有事都同他商讨。最后，每一样资料我各印了500份，每一份都是我亲自装订，再由当时的复旦出版科切边，最后，我再分给自认为要给的人和组织，譬如复旦造反派的头头，各系及学校图书馆等，还有我的一些同学。我想终归有人会留存下来的。

复旦文革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写工作，是很辛苦的。同学们都看在眼里，也知道这些资料的价值所在，就给了我一个“封号”，称我为“太史公”。那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我哪敢担当呢？我清楚这是同学们对我的支持，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我很高兴接受这个称号。同学中至今仍有称我为“太史公”的。

离校前，我还做了一件事。我在10号楼的那间工作室储存了大量资料，包括传单、小报等，其中就有复旦党委大字报组收集的一些。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呢？1966年12月初，复旦党委垮了，这些资料就到了造反派手里，后来又到我这里来了。所有这些资料，有的是原件，有的是抄录件，很有价值。我想得把这些东

西保存下来，当时堆放得乱糟糟的。我就做了初步的整理，有双份的，去掉一份，保留一份；涉及到人的材料就一一归类，杨西光的材料最多，有二三十册。时间上很仓促，我不可能按时间顺序整理了。达到一定厚度就装订成一册，最后装订了八、九十册。多余的就卖到废品收购站，有两、三百斤，六分钱一斤，卖了十几块钱。

几经波折：全部资料“定居”复旦档案馆

离开学校后，我到农场去接受再教育。这些资料有几百斤，我不可能把它们带过去的，就要找一个寄存的地方。我在上海没有亲戚，但我有个同乡，人非常好，住在人民路，住的房子只有十几平米，还有三、四个子女，他同意我把资料放到他那里去。真很为难他了。1970年7月份，我从农场分到嘉定工作，就马上从老乡那里把东西取了出来。我请嘉定的一个亲戚帮忙，他用自行车载了三次，才把东西都搬过来。我还要感谢我爱人，我穷得像个要饭的，但是她接纳了我。我们的房子虽小，但总算有一个住处。这些资料就被安置到阁楼上去了。我坚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能见天日。

八十年代初，复旦校史组来找我，我就知道是关于这批资料的。复旦当时在搞“清查”运动。“清查”要有资料啊，有人告诉他们在嘉定有我这么个人，他们就找到我了。来了两个人，我说这些东西现在能够发挥作用，我也蛮高兴的。他们写了个借条，又专门开了个小车子来，把我复旦文革的资料几乎全部借走了，这是1983年11月12号。

后来的事情就让我想不到了。在资料被借走之后没多久，复旦来信，说有意把我调到复旦图书馆。当时调工作是非常难的事情，我说我的家庭基础在嘉定，家里还靠我，我到复旦去了，家兼顾起来就困难了。后来他们说你爱人也能来，我爱人是中学教师。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啊。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些资料被借到复旦后，复旦的一位党委书记说：“哟，这么多资料，保存得这么完好！”上海市“清查办”的负责人看到这批材料，也震惊得不得了。可是，我调复旦的事后来就“黄”了。因为那位党委书记调到山东大学去了。由复旦文革资料引发的这一番波折，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越发坚信这些资料的价值了。

复旦借去我的资料，十年没有下文。我去信母校查问，得知清查工作结束后，资料转到校档案馆。我要求归还，学校复信说：这批资料保存在校档案馆为宜。言下之意是要我捐赠。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批资料的下落，复旦同意我去档案馆查看。我发现损失不少，杨西光等的个人资料没了，《红卫战报》也没了。所幸大部尚存，专门存档。我很清楚，我不可能追回损失的部分了，要复旦归还，也没

有希望了。当年我收集资料，就是为后人研究复旦文革史提供方便。这些资料确实以存放在档案馆为宜。由个人保存会有许多不测，水灾、火灾都会毁坏资料；我过世，资料保存也是问题。但母校以这种方式获取我的物权，让我不爽。不过，我只能接受现实，予以捐赠，也算我为母校作点贡献。1997年《复旦档案工作》刊登我捐赠资料的消息，并附有一个长长的清单。

后来，有些教授甚至年青的学者都因为研究复旦文革找过我。金光耀教授和金大陆研究员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说要编上海文革资料，为今后的文革研究留下一些最基本的文献。我说你们现在做的工作，就类似古代那些藏书家的工作，藏书家千方百计地收集对社会有影响的各种资料，为保存这些文献，出资刻印传世。我说你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金教授说今年准备将《大字报选》、《大事记》和《名词解释》纳入编印计划，这件事对我来讲，蛮开心的。一来，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二来，这个事对社会有益。只是最好签一个协议，以保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还有个事可以谈一谈。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在写《复旦往事》时，曾来找过我。当时他建议我写复旦文革史，我认为要写好，就得有个宏观的、深层次的了解，我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过，我收集到不少复旦文革奇闻轶事，收在我编写的《文革奇闻录》中。你比如说，《贪吃的红卫兵》一则，记的是复旦文革之初，红卫兵“斗鬼”的事。7、8月份，热得不得了，有人就给“牛鬼蛇神”递了一瓶橘子水。那个台上的红卫兵说，“给‘牛鬼蛇神’吃什么橘子水啊，我来吃！”结果一吃，马上吐出来了，是辣椒水啊！哈哈。这件事蛮有趣，也从侧面反映了文革光怪陆离的一面。再比如说，复旦文革之初就有考教授的事。我们班的同学就考谭其骧，方式还是蛮斯文的。出考题的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他让谭其骧默写四川省的县。200多个县啊，结果谭其骧交的卷子让我们大吃一惊！全部默出来了，而且一点都不乱！大家佩服啊，这叫硬功夫。

我写的这些都是有根据的，也有点像《世说新语》的写法。说的都是小事，但历史正是因为这些小事才更加生动的。正像我讲课一样，不增加一些跟课本相关的、有趣的故事，学生是要打瞌睡的。我编写历史，就想通过这些细节，让读者对历史产生更多感性的认识，也对文革多一些了解。

[被采访人简介]：徐振保，一名收集复旦文革资料的复旦学生（被采访人自称）。

[采访者简介]：王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林升宝，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家事如史

——读刘成杰《不忍离去》

吕 岱

偶然读到刘成杰兄记录、叙述他父母及姐弟的“家事”书稿，其过程是复杂而奇异的，仿佛同时面对两本“家事”，一是摆在我面前的“家事”文本，另一则是我内心涌动翻滚、五味杂陈的“家事”——而我不知道，我是否有勇气像刘成杰兄一样，去发掘、去整理、去证实、去面对、去拷问自家所独存的“家事”。

家事如史。

中国人应该建立自己的家史及家史学。

原因如下：

一是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有诚信，而诚信则必须回到真，或者说以真为一个重要的内涵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一个弥漫了虚假、虚饰、虚伪氛围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并终究要被自毒系统（毒害思想与精神的东西在传播、灌输中不断自我复制形成系统并被当成维系生命的营养自我吞食）所害的。

二是家为社会的细胞，家史是大历史的细胞，或者我们认为，家史就是历史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而重要的存在。与其争什么表面的左右，不如现在就拿起笔来，记录家史，恢复记忆。推开一点，可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为主整理和记录生产队史、工厂史、学校史及班级史、“牛棚”史、菜市场史、俱乐部史、街道史、大院史等等，特别是可以通过口述笔录或视频记录的方式，抢救一些个人史或者家族史，哪怕是零星、局部的也有其价值。

为什么中国家史难兴呢？我认为原因如下：

一是普遍认为写史是历史学家或专家学者的事，个人或家族怎能写史呢。其实这是误区，除了写大部头历史确实需要高度的专业性之外，个人是可以写史的。个人和家庭既是社会生活的存在，也是历史生活的存在，记录家史，是有意义并可能有历史价值的。

二是不敢写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及前十七年，以家谱和族谱为传统的私家记史方式不幸发生中断。由于惧怕，很多人不敢记日记，甚至销毁了日记、书信等等原始材料。

三是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至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管控模式所造成的结果，除了一种声音，其他都是杂音，家史等等当然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一史独大百史黯。

四是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普遍偏低，无力写史。

但是，今天情况有了改变，个人写史的可能性出现了，特别是像刘成杰兄及与他一样的人，放下什么职称评定、课题申报之类而进入自由写作之境，我们当然期待个人与私家写史成为一种趋向甚至形成潮流。通过《不忍离去》，我听到了浪潮远远而来的声音。

我还以为，刘成杰兄的《不忍离去》，至少给我以及身边的朋友提供了模本意义。

首先，以个人立场或家庭立场进入历史叙述，其呈现方式是个案式的，这正是个人家史的根本特征。而它保留的，除了显性的文字历史信息之外，同时会强烈地保留下一个家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家族是需要传统的。

其二，个人勇气和史叙勇气。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特别是遇到近百年来特殊的时代，社会浊杂，人性扭曲，家庭变态，敢于触碰并亮出自家的账本那是不简单的。在刘成杰兄的笔下，涉及到父母离婚和复合，子女嫌弃并仇视父亲的心理记录（犹如中国版卡夫卡《变形记》），以及父亲的两段“情史”，一个叔叔对母亲的追求等等，特别真实。当然，最重要的是触碰父亲被判刑之因（十年至死刑，再改回十年），这需要相当的勇气。我可以断定，亮自家账本是个人写史难以回避的道德门槛，特别对于那些“大人物”来说更是如此。

其三，记录事实与考证事实之严谨。如父亲被判刑的大事，其引述主要来自历史档案，包括法院的判决书及领导相关批示，父亲的自诉材料等；如日常生活小事，引述来自母亲的家庭记账本；对同一件事，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说法，则把不同说法摆出来，然后作者再说他的选择与看法。如此，则很好地记录和说明了是什么、不是什么和为什么。我们看到，通过梳理、辨析、考证，本是一笔糊涂账的家庭历史被澄清了，同时，其中折射出的社会历史悲剧也令人反思。

其四，笔墨平实，内敛，但平实、内敛的笔墨下显示出作者叙述的功力和文采。所以，至少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被其内在的感情和力量深深打动。

补记

《不忍离去》（暂定名）是刘成杰先生的一本家庭历史记录，2010年8月，他回到重庆渝中区纯阳洞老屋，想起小时母亲背他的情景，始而下决心动笔，到2014年4月基本完成，撰有16万字以上，目前尚未公开出版。

《不忍离去》时间跨度大，从1940年代至现在。笔墨涉及父母及姐弟（英、雄、豪、杰）4人。该书以人物为中心，家庭成员每个人都有专章或专节记录叙述，通过不同侧面反映历史。其中母亲的笔墨最重，父亲次之，因为母亲是这个家庭的负轭之人，父亲则是这个家庭受难的主要“原因”。

作者的父亲万首明，在民国时期做过煤矿等生意，经济条件不错，母亲刘祖

贤过着舒适优越的生活。中共执政后，父亲签订合同，去西南军区卫生部代办砖瓦厂负责，为新中国添砖加瓦，不料种下祸根。1951年11月，全国建筑业开展的反对封建把头包商的运动中，认为代办就是包商，因而万首明被揪了出来，军区运动专案组对他家里进行了彻底大抄家。接踵而至的三五反运动，则将他以“打入国家机关”、“大量贪污盗窃国家财产”及“强奸女性”等罪名送进了看守所，始判刑10年，后判死刑，再改判10年。迫于组织压力，为了生存特别是为了子女，母亲与父亲离婚。父亲刑满释放后，户口无挂靠之处，母亲顶着压力又与父亲复婚——但复婚后不可能住在一处，只有送父亲回巴县老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中，父亲如同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家庭，而母亲则扛起了所能忍受和不能忍受的一切，将四个孩子拉扯长大，培养成人。

涉及文革的部分，有两点有突出价值。一是“大毛的故事”中关于“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总部搬家过程中发生枪战冲突导致8人死亡的惨案，及大毛等3人在外贸大楼被关押10天差点打残打死的记录；二是“走进父亲”中，作者上山下乡回巴县老家第一天就遇到父亲被批斗的场景，及在4年知青生活中与身为“阶级敌人”的父亲尴尬相处的景况，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人际关系包括父子关系的极端异化。作者的心痛和忏悔尽在历史细节的叙述中。也许正是如此，作者历时3年多，远访近查，阅读资料、档案，终于澄清了事实，证明了历史。刘成杰的执着和追究，被蒋乐平教授称为“不谙世事的迂阔”。

【书海泛舟】

韩少功纵论文革史的《革命后记》一书出版

陈益南

著名湘籍作家韩少功，不仅是国内杰出的作家，也是严肃的思想家。

2013年年底，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韩少功的《革命后记》。在该书中，韩少功以其广泛深刻的阅读、深邃的思考与曾经的亲历体验，及其见解独到而别开生面的清新文字，纵论了文革历史，为文革史研究拓展了新天地。

韩少功生于湖南长沙，读中学时，曾参加了学校红卫兵造反组织，亲历了文革的许多历史性场面。故而，他对文革的思考，具有亲身经历和体验的坚实基础，而并非仅由书本文字的引发，很值得阅读。

《革命后记》也将在内地出版。今年4月，江苏的文学刊物《钟山》已抢先全文刊载了这部书的内容。

生动的回忆 深刻的反思 ——读《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

阎长贵

说起来，我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过来人，但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本上是在上层（当时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文革小组）当工作人员，偶尔与北京的几所大专院校师生有些接触，而对其他基层的情况基本上不了解，再加上，1968年1月我就被江青诬为“坐探”（时为江青机要秘书），被投入秦城监狱关押起来，一关就是七年半，所以我实际经历文革的时间只有一年半，按照毛泽东说的文革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我所经历的文革也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因此，黄荣华这本回忆录所讲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就十分新鲜，有拿起就放不下的感觉。这本书使我了解到了文化大革命生动具体的全过程，特别是我所不知道的基层普通工人所经历的全过程。

黄荣华这本书可以说是用血汗和泪水写成的。她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当年的疯狂、恐怖、暴烈、残酷、滑稽……还是让不少的过来人想起就惊心动魄，记忆犹新。亲历者能实事求是把自己的文革经历记录下来，对现在和今后的人们真实全面地了解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吸取历史的教训，开创新的生活，是很有益处的。”（《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八一五”派代表黄荣华自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数）她就是以这种态度写这本书的，该书既有对不堪回首的文革过程的记叙，也有朴实深刻的反思，十分难得和可贵。

她是个怎样的造反派

黄荣华1966年参加文化大革命时，只是国防工厂的一个22岁的普通女工（出身于工人家庭），她不仅参加了造反派，而且成为一派头头之一，还被选为厂里的常委，甚至成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而这一切，都不是她去努力奋斗争取的，相反，她还总是想逃避，想往后退，但其所受的教育又使她只能接受（就像当时军代表告诫她的“接受革命的考验”），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沾了是一名女性的光。

长期研究文革造反派的何蜀在给这本书写的整理后记中说：“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据我了解，主要有这样三种类型：

一是因受到压制打击而起来反抗以争得公平正义的人，或可称为‘抗争型’；一是因长期所受的革命教育而积极响应号召投身革命的人，或可称为‘理想型’；一是因见到时局有利于个人一展身手而想为自己捞到好处的‘乱世英雄’，或可称为‘投机型’。当然有的人可能并不单纯就是某一种类型而是兼有不同类型的特征。此外，对运动走向影响不大但却人数众多的，则是芸芸众生中的随大流者了，他们或可称为‘随大流型’。”按照何蜀对造反派的分类，他认为“黄荣华就应该算是这种‘随大流型’中的一员。”我很赞同何蜀的这个分类和分析。

何蜀把黄荣华归到“随大流型”造反派中的一员，他的解释是：“黄荣华这个‘造反派头头’的头衔非常名不副实。她并无造反的动机，只是阴差阳错地被时代大潮推到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中，又被推到了群众组织的‘总部常委’岗位上，更让她意想不到的还把她推到了市一级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委员的位置上。因此，她完全应该算是造反派中的‘另类’。”（第360页）

黄荣华这本回忆录是何蜀帮助整理的，他对黄荣华这个造反派属性认定是有根据的。我读这本回忆录也切实感到了这一点。我说黄荣华“沾了她是一名女性的光”也有这样的意思。比如，她成为重庆市革委会委员，确实是她没想到的，但重庆市革委会中就缺一军工系统的女委员，这个名额就不期而遇地落在她头上——这不是她争着当的，她甚至还不愿意当呢！她回忆录有一节《莫名奇妙当委员》，在这一节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号，我们厂的一号勤务员易永忠给了我一封信，对我说：‘重庆市明天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你是市革委的委员，你好好看一下这封信，按上面通知要求做好准备，明天搭宣传车到市里去开成立大会。’

“我一听就急了，连忙说：‘不行不行！哪个喊我去哟！我不去，你自己去嘛！’

“我们总部另一个常委姜太煊说：‘你还不去？我们好不容易才争来的一个名额……’

“我说：‘那你就去嘛！’

“他又说：‘上面指定要一个女的，不然哪有你的份啰！’

“我说：‘那就叫杨明芳去！她也是女的噻！’

“易永忠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不要争了，还争啥子嘛！上面都已经批了，哪里有说换就换的道理！你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拿上通知，搭宣传车过江去开会就是了。’

“我不想当委员。对文化大革命我有太多的疑惑，太多的不理解。对有些‘战友’我感觉很陌生，不是同路人。前一段就有人说我是‘叛徒’，要把我抓起来……

辛辛苦苦干工作却危机四伏，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越陷越深，能退出文化大革命那就更好。可是，这行吗？

“听易永忠的口气，我当市革委委员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哭笑不得地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听天由命，回家去做准备。

“说实话，我稀里糊涂的，根本就不知道市革委是个什么东西，当委员要做什么？我当时一心想的，就是武斗快点结束，文化大革命快点结束，正常上班，加工资，让母亲不再帮人家做事，让妹妹正常上学。”（第 164—165 页）

黄荣华的这些想法很朴实。我完全能够理解，她的这些回忆也帮助我了解和认识到了当时广大普通群众在那狂热的革命年代里的真实思想。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

从 1967 年 1 月起（确切说从 2 月中旬江青和我第一次谈话起）我基本上和外界隔绝了，我除了收发和管理江青的文件——当然从文件上也能看到社会和外界的情况（包括武斗的情况），但除了作为随员有时跟江青一起出去参加一些活动，她基本上没派我独立地进行过某种对外活动，所以关于武斗的场面除了在文件上看到，我一次也没有直接经历过。读黄荣华关于血腥武斗情况的叙述和描写，我感到很震惊，或者说，惊心动魄。

“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林彪在武斗兴起时曾有这样的感慨，黄荣华对这个问题也疑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斗到处都有，如著名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就有“百日大武斗”，甚至惊动了最高，最后导致了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发表标志文革历史转折的“七二八讲话”。如果论武斗的参战人数之多，“质量”之高，伤亡之惨重，四川，特别是重庆，可能称魁。李木森的《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何蜀整理、注释）一书中有详细的记叙。重庆为什么发生“大”武斗？恐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是“大三线”建设重地，有很多兵工厂，可以造枪、造炮、造子弹——黄荣华所在的工厂就是一个造子弹的兵工厂。武斗动用枪炮子弹，重庆可能是最严重的。重庆至今还保存有一个武斗“烈士墓”，这在全国大概也是“唯一”吧，——望它能永远保存好，让千秋万代子子孙孙永远记着文革的血的教训！

黄荣华在厂里的造反派总部担任“后勤部长”，她在武斗中领着人处理遗体。她对武斗有刻骨铭心的认识。她说：

“我们把那些尸体都运到防空洞里去用冰冻起来了，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整个脑子都被那些死去的人搅得乱七八糟的。那些人，我

虽然并不认识，但是他们血肉模糊的面孔却总是在我眼前晃动……他们死得那么凄惨，他们都是男人，都很年青，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多岁，最小的学生不到二十岁，为什么呀！他们那么年青就死于枪林弹雨，如果是解放军上前线去打击敌人，为祖国的和平，为人民的利益，死了光荣，也死得其所。而他们双方都是工人、农民、学生，互相残杀值得吗？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我想不明白。学生死了，他的父母亲有多么的伤心痛苦！工人、农民死了，他们的妻儿老小靠谁去养？几十具尸体就意味着几十个家庭的破碎、悲哀，我真为他们伤心难过，我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怎么就变成了武化大革命……”（第 157—158 页）

她还细致地分析了参加武斗的各种人的心态。她说：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句话我体会得很深。当时有很多外单位的学生和工人因武斗逃出了原来的单位和地区，在我们工厂避难，其中有个别人心术不正，别有用心，有的人则是血气方刚，没有头脑，还有的人是吃了对立派的苦头，怀恨在心，一心要报复，个别人则不过是社会上所说的“搅屎棍一根”，唯恐天下不乱……特别是一些参加武斗的人，在打斗中找到了快感与乐趣，无时无刻不想去厮杀拼打，他们千方百计地挑动，总想找机会去出击对方。有的头头缺乏判断能力，偏听偏信。这几股力量相互作用，推波助澜，不愁武斗没有导火索。

“在当时还有个倾向：就是越左越革命，越是暴力越算彻底革命。极左的人说话，往往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稍有点理智，不同意极左观点的人，说话反倒还有点吞吞吐吐羞羞答答。对一些事情我有自己的看法，与一些武斗人员的意见不相一致，有的人就因此说我保守，更有人散布谣言，说我是‘叛徒’，要提防我，甚至有人说要把我抓起来等等。听到各种议论我的风言风语，我百口莫辩，实在是想不通，对这个‘大革命’我都有点心灰意冷。辛辛苦苦办事情，说了实话就被当成是‘叛徒’！”（第 160 页）

黄荣华所在的工厂是造子弹的兵工厂。她讲了来厂求援子弹的情况：

“一时间我们兵团总部和装配车间门前热闹非凡，现在才知道，到我们厂来要子弹的人，都是市里面的大头头们指使来的，有的人手持总部的介绍信，有的人手拿着知名头目的批条，有的更是总部的头头亲自陪同前来。比如，志愿军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妈妈，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张思德的妈妈，她们都是以‘革命母亲’的身份来到我们工厂，来找总部的头头们为其所在专县的一派求援子弹的。黄妈妈还满胸佩戴着抗美援朝的各种功勋章、纪念章，在我们工厂的剧场作报告，介绍他们专县的武斗情况，活灵活现地讲述他们那一派是如何在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斗争中作出牺牲的……张思德的妈妈在重庆对‘一〇·二

七’事件发表了强烈抗议的声明，说：那是砸派坏头头黄廉制造的反革命暴乱，还说她不向这些反革命分子讨还血债誓不罢休等等。”（第 161—162 页）

黄荣华还有一点特别值得称道的，就是她毫不隐瞒并且非常痛恨本派即“八一五”派的坏人坏事。她说：我们厂有个女工李德惠，是反到底派观点的，几个孩子的母亲，也被我们八一五派的武斗人员抓到厂里毒打，最后还遭到强奸，整死了。又说，厂区周边的八一五派中学生，这时也大量涌入工厂，他们不花钱在食堂吃饭（时称吃“支左饭”），住在工厂的办公室里。有些学生很不听话，破坏公物，乱拿东西，做些出格的事情，惹得厂里的造反派也看不惯，骂他们是“土匪”。其中有两个中学生，趁当时的混乱，还在附近遛达时强奸了一个农村女孩。还有一件令人发指的事，一九六七年八、九月份武斗最厉害的时候，一些学生娃儿们，抓到了一个“砸派”的俘虏，那个俘虏打着赤膊，下身只穿了条裤衩和一双拖鞋，那些学生娃儿就把那个人绑在一个十字架上惩罚他晒太阳，由于天气很热，那个人的汗水就像下雨一样流淌，人已奄奄一息，耷拉着脑袋似睡非睡。有个学生悄悄地走过去，用火柴去点燃了那个人的腋毛……看到这些坏人坏事，“我不寒而栗，震怒、惊愕、心痛，使我几乎晕了过去……我流着眼泪，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才只有十几岁的学生娃娃都变得那么坏，都变得那么狠心，都能想出那么残酷那么惨无人道的整人绝招？就连渣滓洞、白公馆都没有使用过的招数，他们都能想出来并且用起来。他们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今后长大成人，怎么得了呀！我真不知道也不敢去想像，这个文化大革命，到底要把人们带到什么地方去……”（第 150、148—149 页）

当有的人还在怀念当年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的人还在呼唤“再来一次文革”的时候，黄荣华作为见证人，对那段岁月的血腥恐怖作了深刻的反思，这是非常可贵的。

无法无天年代里才有极端荒唐的事情

我从 1968 年 1 月起就被江青投入监狱关起来了，所以从 1967 年 1 月到 1968 年 9 月全国各省市相继“全面夺权”后（所谓“全国一片红”）建立的红色政权的“全面专政”和“群众专政”的情况我所知更是寥寥。对文革后边几年的情况，如清理阶级队伍、造反派头头进学习班、整党整团、工农兵上大学、知青上山下乡等等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我都从黄荣华的书里看到了从一个普通工人角度所经历和体会到的真实记叙。这等于给我补上了生动的一课。

黄荣华还在书中告诉了我们不少极端荒唐的真实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华蓥山有个国防厂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是个大学生，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他闲得无聊，就在一张报纸上写了许多个“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因为字写得比较潦草，那“万”字的一撇写短了一点，被人上纲上线，揭发说他写的是“毛主席3岁”，那时全国到处都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你却写“毛主席3岁”，那不是恶毒诅咒毛主席活不长的反动标语吗？学习班的领导很重视，立即决定把他隔离起来了，要他交待其罪恶动机。他当然交待不出来呀！在当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含冤跳楼自杀身亡了。（第189页）

她讲这个故事引起我的联想，我在湖南西洞庭农场流放时，曾当过党委宣传部的理论干事，在一次常德地区宣传部召集的各县理论干事会议上听人讲过类似的故事。据说，有个贫农到常德买了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塑像，拿在手里和放在提包里，都怕在公共汽车上挤坏了，左思右想，用一根绳子拴上挂在自己脖子上，觉得这样在公共汽车上也挤不着了，他本来是想保护毛主席的塑像，却被说成他把毛主席吊起来，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还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工人装运沙子，东风刮得眼睛睁不开，有工人说要是刮西风就好了，因而遭到批判，说他反对毛主席说的“东风压倒西风”——把这样极简单和平常的事情也和政治联系起来，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黄荣华还讲了政治性更强的荒唐故事。她说：在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庆祝“九大”胜利之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虔诚地跟着中共中央的决议，高声欢呼粉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之时，她厂里的老工人林绍洲，却公开说他要保刘少奇。

这句话，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滔天大罪、死罪。厂保卫科有人还想保护他，就说他是酒喝多了，说的是酒话、糊涂话。但是，老工人却坚持说自己没有喝酒，清醒得很，并且再次重申他要保刘少奇，还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哪里可以说是坏人就是坏人，说要打倒就打倒啊！”

结果他被抓起来了，送到公安局关了一阵以后就被枪毙了。（第199页）

本来，那个老工人说的是很清醒的常识：国家主席哪里可以说是坏人就是坏人，说要打倒就打倒？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革命年代，越是清醒的常识越是遭到唾弃。践踏法治，无法无天，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不断发生极端荒唐事情的根源！

荒唐的罪名与文革思维方式

读者拿到黄荣华这本书，可能首先都会产生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仅仅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吗？不，这是一桩实实在在的“事实”——不是说她实实在在是江青的干女儿，而是她在文革后被整即清算造反派时确实有人给她扣过这顶帽子，是一种恶毒的污蔑之词。

诚如何蜀所说，黄荣华是“随大流型”的造反派，是造反派中的“另类”。但是她也享受过造反派的一定的风光，开会坐过主席台，也“一呼百应”（她自己语）过，同时她也是一个受益者——被推选为工农兵学员，在中南矿冶学院读书四年，成为一名大学生，最后还获得工程师的职称。她虽然对文革不断地有怀疑、有不满，甚至有愤恨，但是她读了大学，不能不说是一种受益吧。她家极其贫寒，文革前连中等技术学校都只读了半年就被她妈妈逼着退学了（因为家里需要她工作挣钱），而在文革中她居然读上大学了，并且带着工薪，也不影响家庭生活，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江青的干女儿”这个罪名，就因为她给江青写过一封信。她为什么给江青写信？1971年，她已经在工厂里被党支部通过为预备党员。但当时的厂党委中一个有实权的军代表怀疑曾经和她一起管后勤工作的杨明芳有贪污行为，要黄荣华揭发；只要揭发了，她入党就能批。黄荣华认为杨明芳是位好同志，绝不会贪污。军代表一定要她揭发；而她表示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能乱揭发，这样她的入党就被搁下了。她1972年被推选为工农兵学员，带着这个纠结就去长沙读大学了。

1973年，看到福建省莆田县李庆霖老师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毛主席给李老师回了信，还寄去了钱，批评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还因此制定了解决知青生活问题的新政策。李老师不但解决了自己家的问题，还帮助数以万计的知青争取到了改善生活条件的政策。黄荣华天真地认为，中央的各个政策都是好的，是具体执行的人存在问题，只要毛主席一开口，政策就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联想到自己入党被卡的遭遇，她决定学习李庆霖老师给毛主席写封信，反映有个别支左的军队干部不执行党的政策。

信写好了，她又觉得，毛主席工作那么忙，为了自己个人的这点小事情去打搅他老人家不太妥当。于是就想把信写给江青。她从一个普通工人的角度想得很简单，以为毛主席的家庭，也跟老百姓一样，下班后一家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工作之余一起休息、聊天。江青可以在毛主席空闲时转交她的信，或者转述一下她信的大致内容，毛主席不是还看红卫兵编印的小报吗？……

就是这样一封信，这样一个天真纯朴的举动，没有想到几年以后，在“粉碎四人帮”后清算造反派的特殊时期，这封信被转到了黄荣华的厂里，成了别有用

心的人欲置她于死地的“钢鞭材料”，说她是“江青的干女儿”，写信向江青要什么什么等等。

黄荣华百口莫辩，气愤至极。她与江青素昧平生，没有任何接触。曾经写过一封信，也只是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反映厂里搞清队的时候不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想让毛主席知道他下面的小官僚是如何在违反他的政策，个别军代表为了个人的业绩、个人恩怨，大搞逼供信。她的信上没有任何“卖身投靠”或“表忠心”的内容，有什么错吗？（第 312 页）

读到这里，真让人感慨万端。江青当年把我无端打成“坐探”，诬为“反革命”，而粉碎“四人帮”后的“揭批查”运动中则有人把黄荣华诬为“江青的干女儿”，我们被强加的罪名不一样，但是都同样荒唐，这种整人的方式也是完全一样的。这使我联想到老干部徐明清的《徐明清回忆录——明清岁月》中讲到的她的遭遇：徐明清因在白区工作被捕过，其实早有审查结论，文革中在农业部被打成“叛徒”，粉碎“四人帮”后她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却又被中央专案组关起来逼供，要她承认 30 年代给江青写的材料是“包庇江青”，仍然采用文革中那套整人手法，甚至还把逼得她头昏脑胀、身体和精神都垮了的情况下由专案组编造的不实材料作为附件，放在批判“四人帮”的中央文件里印发全国。徐明清在三年后获释出狱才知道有这样令人愤慨的事。有一天她碰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赵丰，他说：“我知道你快出来了。胡耀邦同志到我们单位做报告，说‘四人帮’粉碎后，我们还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他一口气说了二十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你。所以，我知道你快放出来了。”（《徐明清回忆录——明清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3 页）胡耀邦同志说得何等精辟啊！文革结束后，即粉碎“四人帮”后，不仅还有乱抓人的事，还乱杀人嘛！王申酉、史云峰、李九莲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就是粉碎“四人帮”后被杀的吗？！

为什么一些人在批判“四人帮”时要使用“四人帮”整人的同样手法？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化大革命虽说是结束了，但是整人那一套传统犹存，那种思维方式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之中。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的。

这本书引出的一点感想

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年一先生在生前为《亲历重庆大武斗》（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写的序言中说：“文革研究专家，大致有两类：一类姑且称之为‘眼睛向上’派，一类则为‘眼睛向下’派。‘向上’派注重研究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文革的发生和发展，毛

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多做宏观的研究；‘向下’派则注重研究中国的老百姓，研究广大的青少年，研究上层的举措在下层的反响，等等，他们多做微观的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做上层的研究越来越困难，人为的阻力不小。下层的研究，禁忌相对较少，人们对下层研究的重要性也比过去更清楚，因此下层的研究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指出“何蜀兄早就有志于研究下层的问题，他整理的这部书稿可谓‘眼睛向下’的难得之作。”

由于我的文革经历，我对于文革的研究恐怕属于“眼睛向上派”，我对“向下”的研究做不了，但我对“眼睛向下派”的著述是很重视的，很乐意阅读的；我读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写了读后感，现在读黄荣华的《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又写了读后感，可以算做我尊重“眼睛向下派”的一种表现吧。近年来，“向下”的研究蓬勃兴起，很多地区、很多单位都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向下”的研究前途无量。

当然“向下”的研究和“向上”的研究不是可以截然和绝对分开的，它们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即是朋友，不是对手。“向下”的研究和“向上”的研究相结合——完满和完全的相结合，即互动，不抱成见地相互吸收和运用对方的研究成果，是写出和写好文革真史、信史即骨骼健全又有血有肉的文革史的正确之路，健康之路。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互相勉励，携手共进！

【故纸堆】

珍贵的文革历史文献——《论现状》

石名岗

摆在我们面前这份文革时期的“反革命集团纲领”，虽然已经不为现代人所知，但其内容却很像后来改革开放的指导性文件，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都具有特别的意义，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山西省太原市破获了一起反对“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的“反革命集团”案，因该集团的领导人是太原化肥厂职工张珉、赵凤岐，故被称为“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张赵案由陈永贵上报中央政治局，江青批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集团”。江青还具体批示：“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要尽快查处，并追出黑后台！”由此，该案成为当时由中央政治局督办的案件。

张赵集团主要由原山西省造反组织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部分学生骨干（当时

已参加工作）组成，也有少数年轻职工和老干部。其中张珉（原太原重机学院学生，时为太原化肥厂技术员）、魏润福（原太原三中学生，时为山西省运输公司团委负责人）、赵凤岐（太原化肥厂武装部副部长）都是原红联站的领导成员。

这是一批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早就对“四人帮”迫害老干部、反对发展生产力等做法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张赵等人就组成“自修大学”，学习马列，谋求救国之路。到1974年，逐步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甚至号称有“武装”的“中共中央第二委员会”（据当时张赵的资料称，中央“二委”的主席为周恩来，统帅为叶剑英）的“太原支部”。1975年事发后，张赵等人被捕。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以张赵案“牵扯到毛主席”为借口，判处张珉等三人死刑，多人被判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及拘役不等。此案一直到1979年才由江华主持的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平反。此案在山西省影响极大，山西省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颠倒是非概念，把反“四人帮”的张赵集团，作为“四人帮”爪牙来清查，牵扯到了数千人。

我们提到的《论现状》一文，就是当时张赵集团观点的总表达，是张赵集团思想的结晶，可以说是张赵集团纲领性文件。文章从现状、理论、对待党史问题、经济政策、知识分子、干部问题、路线斗争、文艺等八个方面批判了极左路线，提出了自己相应的主张。张赵的许多观点都与后来的改革开放的思想相同或相似，有些观点至今都应该是奋斗的目标。

《论现状》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当时文革一代人的觉醒的开始，1976年太原市的“四五”运动中，就有未被捕入狱的张赵集团“残余分子”成为领导和骨干成员。

《论现状》的意义还在于，它代表了文革一代人中的先进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这是支撑改革开放的群众思想基础。它既有研究历史的意义，也有可以起借鉴作用的现实意义。

《论现状》的作者张耀明，当时是太原化肥厂青年工人，生于1948年，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在校时期就喜欢研究理论。1969年，张耀明分配至太原化肥厂消防队工作，后又在硝酸车间工作，曾任车间团支部书记，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1年以后逐渐与张珉、赵凤岐等人形成组织，是张赵集团的发起人之一，在集团中负责理论和宣传工作，号称是张赵集团的理论家。《论现状》约成文于1974年到1975年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论现状》原稿能够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得益于张耀明同宿舍的工友刘璞。在张耀明被捕查抄宿舍时，刘璞机智果敢地将写有《论现状》的笔记本保护下来，未被抄走。我们真是应该感谢这些有胆有识的人们。

张赵集团主要人物简介——

张珉，1944年生，家庭出身贫农，山西省朔县城内人。文革前是太原重机学院大二学生，文革中曾为重院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联总”总勤务员，山西以学生为主的造反派组织“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总勤务员。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毕业分配到东北某厂，七十年代初调到太原化肥厂汽车队任机械员。张赵集团的发起人之一，张赵集团组成时是该组织的“党支部书记”。1975年4月22日张赵事发后被捕，1977年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79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平反。平反后一直在家养病。晚年信奉了基督教，并在家中设置了传教场所。2008年左右，曾向宗教局申请牧师资质，未获批准。

赵风歧，1944年生，家庭出身贫农，河南省滑县人。文革前为太原化肥厂工人。文革前期为太原化肥厂造反派组织负责人。曾任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职工部部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太原化肥厂武装部副部长。张赵集团的发起人之一，张赵集团组成时是该组织的“党支部副书记”并负责组织发展及武装工作。1977年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平反后任太原化肥厂大集体企业（劳动服务工司）负责人直至退休。

罗建中，1950年生，家庭出身干部，山东省冠县人。文革前是太原六中初中学生。1969年参加工作，七十年代初调至太原化肥厂造气车间。张赵集团的发起人之一，在组织中负责外联工作。1977年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平反后回到太原化肥厂工作。改革开放后，调至山西省交通厅，后又任山西省煤炭管理局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

张耀明，1948年生，家庭出身干部，山西省武乡县人。文革前是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初中学生。文革中为山大附中红卫兵造反组织“八一八”（红联站下属组织）的负责人之一。1969年参加工作，先在太原化肥厂消防队当消防员，后在硝酸车间当工人、团支部书记。张赵集团的发起人之一，在组织中负责理论和宣传工作。1977年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平反后从太原化肥厂调至山西省工贸学校任总务主任、开发办主任。2008年退休。

魏润福，1945年生，家庭出身工人，山西省太原市人。文革前是太原三中高中学生。文革中为该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红旗”的负责人，红联站代理总勤务员。1969年参加工作，分配到山西省汽车运输公司，被捕前为山西省汽车运输公司团委副书记。张赵集团主要骨干，负责组织发展工作。1977年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平反后回原单位工作，后任山西省汽车运输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

李兆田，1939年生，河北省宁晋县人。山西农学院毕业，1965年分配至晋中专署水利局任技术员。文革中任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总司令，山西省革命委

员会委员，山西省水利局副局长。张赵集团主要骨干。1977 年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平反后因“文革造反”问题未能恢复原职，1984 年未能登记党籍。后被台资企业聘任负责人，负责太原市汾河两岸的开发工程，后因政策有变，开发未能实施。后在省水利厅退休。

平崇义，1925 年生，家庭出身中农，山西省壶关县人。中共执政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文革中任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革委会副主任。张赵集团主要骨干。1977 年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平反后任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至离休。

2014 年 4 月 22 日

【故纸堆】

论现状

张耀明

目前，谈论现状的气氛，十分浓厚，群众对市场供应、经济收入、婚丧嫁娶、文化艺术、工农业生产情况、上层建筑、政治运动等议论颇多。如何应用马列主义观点，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一剖析并提高到“路线斗争”的水平，加以理解，进而给予理论的说明，绝非易事，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其本质来讲是革命的批判的。”因此谁背离这一原则来研究现状，必然会走到两个极端：（一）毫无分析的肯定一切，按报上所宣传的去看待一切，认为世界一片光明；（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认为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可言，进而恶意污蔑。我们想避其两极取其中，按自己真实的感受谈几点看法，供同志们考虑，以期引起争鸣，求得一致。

一、目前现状的根源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自党的九大以来，我党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总的讲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执行了一条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极左路线，可以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目前现状的总根源，现实中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可笑荒唐事例的层出不穷，都是这条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它对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已造成了很大损失。

二、这条路线表现在理论上

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脱离开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片面突出强调阶级斗争，错误的提出

一种实质上是以搞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包括阶级斗争）的历史。生产力是历史发展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群众创造历史”这一著名原理，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社会诸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是第一位的，而各阶级的关系必须依赖这一矛盾的存在而存在，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如果不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无法讲通现实的阶级斗争，也无法说明党内路线斗争的客观依据和根源，也无法讲清楚“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的理由。事实上群众看到的却是它的反面，革命没有解放生产力，政治运动影响生产，政治与生产实质上存在着对立，尽管批判了生产好≠政治好，也≠路线对，“抓革命”并不促生产，路线对生产仍然上不去，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关键在于我们的阶级斗争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其具体表现是：(1)空洞抽象，脱离实际；(2)循环论证，只求自圆其说。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抓阶级斗争、推动生产力发展等等大话皆属其例，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与发展，本质上是趋于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对立的，在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在经济基础上早已失去了同无产阶级对抗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虽然存在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余孽虽然会“人在心不死”的组织各式各样的反抗，利用残存于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点向我们进攻，但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们也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主要阻力，促生产的根本办法，在于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

如果不解决所有制（机械化与三级所有）相互关系（干部、知识分子、领导与群众、工农之间）及分配问题（工人工资、农民收入），而抛开这些现实问题去搞抽象的阶级斗争，那么这种阶级斗争只会越搞越激烈。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进行 25 年了，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但国民经济的发展，虽时有起落，出现马鞍形，可并不一定和阶级斗争的程度相一致，难道我们能说阶级斗争影响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吗？当然否认政治工作的作用，否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是不对的，可如果由这个正确的前提推导出“阶级斗争是生产发展的唯一源泉”也是错误的。列宁说，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说服不了群众的，我们现在的理论不正是如此吗？

目前我国的工农业水平、机械化程度、人民的生活水准还很低，但我们国家从人力到生产工具，自然资源潜在的能量是很大的，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呢，人民群众为什么不能真心诚意、拼命干活为国家富强、个人富裕而自觉奋斗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党的路线有错误，政策不明确造成的，具体说主要表现为：

（一）工人的积极性普遍不如过去高，干劲不大，出勤不出力的原因，是多

劳不多得不如少劳不少得，口头上讲的“思想觉悟提高了”，难敌十年不长工资的现实，因此，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是表现不在生产上的，仅抓阶级斗争是无法解决吃饭问题的，说到底，造成目前生产力低下，工人技术水平下降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太少了，不是我们的抓阶级斗争运动太少了，而是太多太空太不切合国情和群众思想实际了。长期这样搞下去，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反感，把他们推到新生事物的对立面，致使我们头头是道的革命理论成为和者盖寡的说教。

（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之一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我们目前流行的口号叫“七、八年再来一次”，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这不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现实总结出来的经验，而是人为论，是意志决定论，似乎搞阶级斗争也象作五年计划一样，凭我们的主观意志就能决定其进程。

（三）我们的理论似乎有种特殊的气魄，大有在不解决经济基础所必然产生的矛盾的条件下，通过上层建筑的所谓革命就消灭阶级斗争的决心，这样做虽然热情可佳，可惜办不到，事实上如果社会主义不在经济实力上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不能像资产阶级战胜地主阶级那样在经济地位上超过对方，取得不可替代的地位，那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只不过是句空话，正如列宁所言，社会主义若不能在物质生活上战胜、优越于资本主义，它最终是要灭亡的，现在很多人羡慕西方国家，他并不看重资本主义制度，而眼红人家的物质生活，因此我们仅凭宗教式的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行精神共产主义，只讲精神不讲物质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骂苏修美帝不如自己，可一贯正确的我们又老越过物质讲精神，在人民生活水平上，赶不上垂死的资本主义，又怎能让人民体会社会主义优越性呢，难道土豆烧牛肉比窝头更不合人民的胃口，吃了就会变修？我们认为只有当我们在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超过帝国主义时，资本主义复辟才是可以避免的，但实际上我们目前的经济政策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本来如何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科学化、迅速在经济上摆脱我国的一穷二白面貌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可惜天天讲的大道理，又丝毫不涉及这个问题。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主义阶段存在阶级斗争，也不否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性，但必须弄清一个基本问题，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究竟由何而来，主要表现形式，是不是党内路线斗争？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1）旧的反革命势力与苏美蒋的暗中活动；（2）旧的习惯势力，旧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与斗争；（3）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因社会分工的不同（脑力、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等）和分配不公平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三大矛盾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矛盾，一切政策的制定都应当以此为依据，离开这些

去讲阶级矛盾和斗争，或采用同一种形式解决不同的矛盾，都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三、这条路线表现在对待党的历史上

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事件评述，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根据需要肆意歪曲，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同一件事昨是而今非，今天肯定一切，不许别人说半个不字，明天否认一切，骂得一钱不值，好事也是别有用心所为，结果是除了当事人，大家茫然然。比如对待林彪就是突出的例子。

（一）毛主席对林历来是深知其人的（见主席给江青的信），可为什么又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各种形式，大树特树，订到党章上作为法定接班人呢？按恩格斯讲，党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党的领袖是在斗争中自然产生和确立的，但我们对林的确立方法是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唱对台戏的，是搞唯心主义和权术。事实上任何党派，都不是靠某个“天才”来保证其不变质的，党的发展是个历史过程，要变有其根源必然性，不变也有其根源和必然性，并不取决于某个天才的存在与否，在历史上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并未能阻止陈独秀、王明之流上台，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因此，党是否要变修，修正主义能否上台，靠的是党的整体，而不是哪个超群出众的人物，把林彪订在党章上，实质上是承认英雄创造历史，是地地道道的天才论翻版。

把林订到党章上，作法定接班人，自马列主义以来，始无前例，尽管有人美其名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如说是彻底背叛了马列主义的政党学说，现在我们的理论家们，回避“把人写到党章上”这一根本错误，避实就虚，大谈什么“对林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美其名曰为唯物论的反映论，说穿了，这只不过是自圆其说的伪哲学，关键在于，任何党章都不应当成为党的领袖的遗书，无论如何功昭日月，也无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党，如果谁超越党章的范围行事，把个人摆到不适当的地位，号令全党，谁就是“天才论”者。

（二）毛主席说，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评价一个政治家时，分析个人的动机固然是研究历史事件的一个出发点，但他的政治活动，有何客观意义，他如何扮演了一个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角色，更是我们借以评价其历史地位的依据，自批林批孔以来，批林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喧嚣一时，其实那只不过是林居室的一条墨迹，就实质而言，林彪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要点在于散布、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所以批林主要应该批极左而不是批极右，否则理论联系实际，对工农群众来说，就是一句空话。因为9·13事件对群众而言，其流毒何在，天王老子也说不上来，反之，精神万能，有了精神就等于有了一切，精神成了超脱物质基础的神秘力量，脱离实际提倡突出政治，为政治而政治等最最革命的口号和理论，才真正是群众所讨厌的。为什么就不敢面对现实理直气壮的批极左

呢？林彪所起的作用与他本人欲达的目的是相辅相成的，但对革命的危害，则是有左而无右的，究竟应该批什么，为什么批右而不批左，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三）我党与林的斗争是9·13后公开化的，据说主要矛盾是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斗争的激化。

其实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任何马列主义著作和政党实践中，都不能成为一个原则问题，设与不设，谁想当与不让哪个人当，这都是党内权力之争的表现，无所谓原则不原则。

人所共知，林是党章上规定的接班人，是否担任国家主席，既可顺理成章当上，也可不当，完全可以通过党内的民主讨论解决，如果林因自己未能当选而产生怨恨之心，公开或隐蔽的篡权谋位，那么是可以讲路线斗争的，也是有是非之争的，可惜的是报上的解释有点离谱，不敢说真话，只强调毛主席六次讲不设国家主席，又不讲为什么不设的理由，老百姓能不怀疑这是权力之争，而不是路线斗争吗？

（四）批林批孔，越批越说不清，先曰批林整风（批极左），姚文元说是极右，于是乎又批极右，没几天又说林彪与孔子有关系，又批林批孔，最后变成批克己复礼，似乎孔子和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批极左也算倒退，真乃奇谈。

为什么一个运动会有如此多的反复呢？有人说这是逐步深入，说穿了，应该叫逐步自圆其说。9·13事件的发生是什么政治性质，中央是清楚的。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却是一时说不清楚的，只能现编现说，先干起来再顾其它。

我们认为对林的理论纲领、政治纲领、行动纲领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林彪的许多讲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被当作公理看待的，突然全错了，错在何处，如何理解？我们认为报上的讲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王明批李立三，嫌他左得不够，具体表现为有些人对许多模棱两可的话妄加曲解，抓住片言只语大做文章，从字眼行间里找出很多正常人无法看见的反动思想观点，连林彪箱子里的纸片也成了证据，所以尽管秀才们说的头头是道，可群众依然不明白林彪的这些反动思想与他们的处境有何关系，侵犯了他们哪些既得利益。

（五）路线斗争的规律

路线斗争这个词自9·13事件后，在群众中的解释，实质上已成为宫廷政变，争权夺利的代名词，已远离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的表现总是：首先吓一跳，其次跟着跑，边骂边检讨，由报抄成稿，过后当笑料。而内心的真实思想则是，除对党的个别领袖信任外，其他都怀疑，党的整体威信下降，如何反修防修无关痛痒，尤其对突如其来的路线斗争更是防不胜防，无所适从，一切听天由命。再动听的说教也刺激不了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的神经。

四、经济政策上的弊政

政治经济学上讲，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是生产关系的三大要素，我国在所有制方面，还存在全民与集体的矛盾，分配方面也有不公，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远比我们每天所讲的大道理复杂得多，很有必要认真研究。

列宁曾经说过，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程度，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但我们目前的作法，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只讲变革生产关系而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土地改革而言，解决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实现了耕者有田的梦想，过去热情空前高涨。但因生产工具的落后，他们所发挥出来的劳动生产率，依然局限于手工劳动量的极限内。因此，解放的生产力大小不是取决于思想如何，而是取决于人控制自然的能力，取决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程度。（但我们那些喜欢把人的因素第一，“发展”为精神万能、意志决定一切的理论家们，所倡导的最终结果，也不过如此。作为农民，不管是社会主义觉悟高，还是为个人发财想得远，都可以拼命劳动，但从解放生产力的方面考查，二者结果一样。）

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几次变革之后，农民虽然由个体变成了集体，对发展农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在生产队所有制下，农民干劲不如干自留地高，集体粮长得不如自留地好，这种现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说先进的生产关系造成落后的生产力的原因在于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低，认为只提高觉悟就会使生产力上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那可谓是最大的唯心主义理论。

农业方面：

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到今天，农业学大寨与农业机械化，哪个更起决定作用呢？我们认为后者而不是前者。如果不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中国的农业将永远徘徊不前。目前存在的现实矛盾，国家工业化与农民吃饱饭的矛盾，国家与集体的矛盾，集体积累与社员个人收入的矛盾，仅凭我们天天讲顾全大局，利益兼顾是调动不了积极性，也改变不了现状的。对农业的改造，对农民的改造必须是保证农民吃饱条件下的改造，脱离开农民每天最迫切的肚子问题，去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说穿了是哄鬼。谁会真心实意去拥护饿肚子的革命呢。我们认为在机械化方面，国家支援了农民许多东西，可惜的是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因此是应该在现有的所有制形式下，进行机械化，还是应当通过一次新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进行改造，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农民和农业飞速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的。我们认为解决困难的出路在于三至五年内把农业的集体所有制，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充分利用土地、人力、矿产资源，建立新的农村生产体制，种粮的种粮，开矿的开矿，养殖的养殖，经商和运输业配合，把多余的劳动力从简单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基础上，减少农民在农业人口的比重，让“钱广”（注：浩然小说《金光大道》中

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面人物〔本刊注：钱广应为电影《青松岭》中人物，原注有误〕们发挥一技之长，丰富城镇人民的吃饭花样。

工业方面：

列宁说，社会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群众生产积极性的调动，除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外，必须伴随必不可少的实物奖励。而我们的现状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不搞物质奖励，虽然在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但自批判物质刺激后，不愿承认物质奖励能激发生产积极性，尤其不愿使用刺激这个词，似乎激发出来的积极性一与刺激有联系，就有了政治问题，就成了修正主义的产品。对这种闭着眼睛说瞎话的自欺欺人之谈，本不值一驳，可其对现实生产造成的破坏，却不能不说。

正由于我们否认刺激的积极作用，严重的挫伤了工人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打击了工人争取由不熟练工人成为熟练工人的上进心，造成了工人技术水平的普遍低下。

我们现在的评级制度是“以年划线”，其后果是不分优劣，一视同仁，无需立新功，全靠吃老本，吃老本也骂人，因为工人并不同意绝对平均主义式的分配方式。比如我的师傅现有四个小孩，工资39元，我69年参加工作，工资亦是39元，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法权表明表面上的平等，反映了实际上的不平等。本来提倡经济上的绝对平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左倾小资产阶级搞空想社会主义的前提。可悲的是我们的理论家们，竟把蒲鲁东当成马克思，颇有兴致的以推行这种不平等为满足。忘记了我们的任务在于消灭这种现象，而不是拼命维护它，饿上肚子为它唱颂歌，消灭它的办法就在于评级定薪。给工厂工会组织一定的权利，由工人组成技术评定委员会，通过一定的方法决定工人的工资，如果离开任何具体问题，去空谈社会主义政治和觉悟，那简直是宗教骗子。

我们要讲忆苦思甜，但目的并不是让人们满足于今天物质生活水平的可怜，而是为了激励人们克服今天的困难去争取美好的明天。

马克思主义有句名言：“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定的革命觉悟，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形成的，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谈提高的，离开今天的现实去谈人人都应当具有的，脱离时代的高觉悟，是荒唐的抽象说教，是对绝大多数人行不通、听不明、做不到的事。

在解放前吃过糠咽过菜的老辈人中，革命对他们的要求与今天对我们的要求能相同吗？

他们打倒地主分胜利果实，我们多干了不应多得，他们流血牺牲是为了可见的利益，我们提高觉悟是为了少吃不喝，他们斗争时有牺牲，是环境造成的，有自我牺牲精神是现实的，我们生活的环境变了，怎么能老具有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的觉悟呢，如能把这种动员转变成学知识搞科学的号召不更切合实际吗？

在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表现在分配上，体现为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消灭这种差别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实行物质奖励。

每个家庭，在当今时代，都是一个小经济私有单位，工人所得报酬与这些家庭存在的经济困难靠什么解决呢，是靠感恩戴德式的救济方式好，还是靠工人在全民所有制或业余工作条件下，通过个人多劳动，领取高点的额外报酬来解决更好呢？我们认为，各尽所能，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是对的，可有饭吃的理论家们，偏不许这样作，既不计工资奖励，也不许计件工资复活，硬要让积极的无所得，困难的更消极，害家损国，骂大街，空着肚子唱高调。非此似乎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

防止修正主义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固然很重要，但这些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说教一样，都离现实太远了，如果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尖锐对立时，如果窝头不给吃，硬让大家等饿死后吃面包，这样做的结果会是怎么回事呢？现实的问题是过左的政策已经造成严重冲突，在群众生活水平日趋要求提高的时候，不去动员大家制造财富，唯恐穷人变富则修岂不太可笑了吗？大立柜之风说明了什么，养鱼走后门说明了什么，青年一代普遍的生活要求物质条件是什么？对这些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唱高调的先生们，你们关心过吗？离开那套说教的陈词滥调，你们敢回答吗？

讲马列主义过了头的人常是骗子，每天喊反修防修的人，自己就是修正主义者，名义上他们在反修，其结果是帮修，越防越修，防不胜防必然复辟，把中国变成封建帝国式的国家，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稳操篡权术，以左代右，搞阴谋创造条件，有意置人民死活而不顾，唯恐天下享太平。

五、知识分子问题

毛主席说，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目前我国的知识分子状况如何呢？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着严重的三脱离倾向，在所谓的三高政策影响下形成了知识分子重理论轻实践不深入生活的偏差，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方面，还是本着依靠、相信、适当安排，注意其技术特长的发挥这一基本原则正确对待他们。

我们现在的作法，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对党的一贯政策不做分析，全盘否定，都算到刘少奇账上。由重视、相信、使用、培养的方针，变为歧视，打击的政策，批判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学生也因其先天不足犯了原罪，成了旧教育路线的替罪羔羊。在大专院校学生的分配上，一切从“接受再教育的前提出发，视劳动为惩罚”旧知识分子的最好手段。哪脏、哪累、哪里劳动强度大就分配到哪，似

乎非此再无别法宝，可美其名曰为改造，其结果不仅给广大知识分子增加了精神负担，浪费了青春年华，放弃了所学专业，而且造成了思想上严重的对立情绪。如让上海同济大学的毕业生去原料工段舞大铁锹看皮带，让学高分子专业的烧锅炉，让学重型机械制造的看火车道口等等。怪事层出不穷，我们无法理解，如此再教育法怎能让受教育者安心本职工作。可我们的大理论家对此怪状视而不见，只会和尚念经似的一遍遍重复知识分子不如工人农民的老调，完全不承认知识分子有其长处，只会抓住短处大做文章。事实上农民伯伯再伟大，也不会让母鸡生出原子弹，有制造卫星本领的人何必非学种高粱的本事不可呢？说到底，我们是在消灭知识与科学的基地，完全压抑了知识分子发挥自己长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意用愚昧改造知识，似乎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除了出身臭汗别无它法灌进去。

在报酬方面，知识分子的工资高出小徒工几倍，与老工人也相差无几，可工作性质都一样，是国家用高价给工厂买来的低能劳动力，在此条件下，工人、知识分子双方都不满意，工人认为知识分子除了念过几本书，啥也干不了；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政治上低人一等，工作业务上不受重用，所干非所学，是机动劳力工，学了几年数理化，不如老工人满口粗话没文化，根红苗正敢当家。正是在这一现实条件下，才出现了“学了无用论”的论调，但我们那批左的可怕、惯于发现毒草选拔香花的英雄们却借机大做文章，从孔夫子那里寻了句鬼话“学而优则仕”与此抗衡，指责这种观点的本质是读书做官论的翻版。简直是指鹿为马，有意歪曲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事实上，学理工的人志在当官的又有几人呢？值得警惕的倒是，专用胡诌马列主义词藻整人的家伙，才是真正想作官哩。

中国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甚少的国家，若这一小部分人也不能自觉泼命搞科学技术，我们的工业水平、农业现代化靠什么来提高呢？难道仅靠学大寨就能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吗？

尽快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可我们正确的知识分子路线，偏又以此为敌整天让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动辄一盆凉水迎面而来，又谈何积极性呢？试问，如此高明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正确吗？

知识分子的改造，在社会主义阶段，在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时代，永远是需要的。但这种思想改造的场所、方法，都应当以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为出发点，结合具体工作、生活条件来进行，根本不当采取目前这种形而上学的劳动改造式，解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

工农兵上大学是件好事，说明中国仍然需要知识分子，但我们的说教，却太可笑了，似乎通过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招生方法，就可以消灭了知识分子这一特殊阶层，就可以取代小资产阶级这个阶层，消灭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的区别。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是永远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使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不在于学生的阶级出身和来源。这点常识，大理论家们难道也不懂吗？工农兵上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知青只要与工农兵有缘，也可以不学 ABC 进高等学府，充当高材生，有关系的找关系，有后门的走后门，名曰推荐，实为挤进，如此质量的学员岂能搞好教育革命？

我们希望国家不要忘记，那些参加工作几十年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功勋，莫将他们全赶进牛棚去改造灵魂，更不要忘记那些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考验真正走向工农相结合的历届毕业生，唯他们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可靠栋梁，我们希望国家委以重任。

六、干部问题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是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惜的是，这批宝贵财富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态度暧昧，热情不高，虽然主观愿望是很想把“抓革命，促生产”搞上去，全面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可行动起来，表现的“理解很不深刻，领导很不得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原因在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们永跟不上的天书，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条条，他们根本看不清，摸不见。今天并不知明天该怎么跟，拥护谁，反对谁，何为对错是非，运动总是东风西雨无法预见。自身如同枯枝落水，难以自主，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方面，只见破而无立，除了空洞的原则性口号，没有政策法规指示，导致遇到问题无所适从，只得不了了而止，更不敢谈主动性，聪明才智全被路线斗争的复杂性压缩了。头脑里除了混乱的政治术语，就是提心吊胆，明哲保身观念。即便不干也不能干错，这种情绪可谓大矣。“干革命怕的是犯错误”这句套用“大海航行靠舵手”谱成的词真是至理名言。

特别是路线性、方向性的错误，更为他们所忌讳，首先思想上无法分清抽象的修正主义在实践中有何具体表现；其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非面面俱到，什么事都能指导；第三，对路线斗争的高深莫名其妙，难以分清是非，自己认为对，干的结果则是错的。总之无权怀疑别人，只能怀疑自己，越干越缩手缩脚，动辄得咎。而群众运动的矛头又常指向他们，时刻处于风箱老鼠的架式，对上不理解、跟不上，对下无措施，管也不对，不管更不对，只能上跟领导跑，下跟群众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埋头琐事瞎忙，但求平安无事。

更为可悲的是他们把“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变成了“抓生产”才能证明“抓革命”的不二法宝，为给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在生产上不计成本，千方百计割肉补疮，只有产值没有利润，十块钱生产出一块钱的成品，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种局面的形成干部们并没什么责任，问题出在我们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在实际工厂生活中政治挂帅=政治运动=政治活动形式=开批判会，读报纸、扯闲篇、聊大天，浪费时间不干正事。“促生产”就是具体干活，不讲科学胡干蛮干，出了事故，人人有理人人无责，出了大事，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在此社会大背景下，我们的干部，徒有忠心报国之志，没有真抓实干的胆略，企业生产技术落后，停滞不前已成现实，再吹“形势大好”有何颜面？

七、路线斗争问题

四届人大几经宣布，一拖再拖，迟迟不开，原因何在？大家都明白这是党内斗争的外在表现，我们希望随着矛盾的激化，把斗争产生的原因，斗争的焦点以理论之争的形式，以有组织的公开方式，向党内外公开，经过大民主来解决问题，不要再搞十次路线斗争的方式，搞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但我们党的十次路线斗争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公开，一切都在“战胜了机会主义头子后”才突如其来，自上而下逐级向党员和群众传达宣传，这种政治方式，从长远看，是一种危险的创举，即可帮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借政变合法上台。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任何号称马列主义的政党都公认的，党内的矛盾，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经常发生是自然现象，要保证党的领导高于一切，就必须实行党内民主，公开向全体党员说明情况，通过党内的民主表决，实现全党统一，按列宁所提倡的那样，党内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矛盾就应逐渐扩大，在更广一级的范围内解决，各抒己见的两方都可以讲自己的道理，方法无非辩论一下，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广大党员自有公论，而且只有这种自上而下的党内大民主方式，才能保持我党不出修正主义，不出现大分裂，不出现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党的局面，才能保持党的纯洁。

鉴于历史教训我们认为，以党内斗争的角度而言，每一个党的领袖、领导人，都可以光明正大的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有权通过电台、报纸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方案的特殊权力。而苏联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内民主权力高度屈从于个人权威之下。以我划线，把个人与党看成同体，反对派一发表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帽子。在政治上，肉体上判处死刑，强行剥夺领袖人物的申辩权力，不让人讲话，实行党内独裁，导致斯大林时代的黑暗。而这种党风也造成了赫鲁晓夫的上台。不要忘记赫鲁晓夫是喊着列宁主义走向修正主义的。这是血的教训，我们也要谨防某些人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幌子，借着批刘邓、批林彪，搞借钟馗打鬼的把戏，篡党夺权，祸国殃民，“复辟帝制”真成了武则天。

现在有言道“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话固然不错，但若以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为例则很难理解，因为我们公布的正式文件中，没有什么材料证明林彪个人想反党，要反党的政治动机，仅是个想当国家主席的个人野心家，想政变而已。用林立果选妃，叶群和黄永胜生活问题做文章，固然可以把他们搞臭，但也证明不了这“属于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上升不到路线斗争的高度。571工程纪要是林彪最主要的大罪，但它只能证明9·13是一场流产的未遂政变，是党内权力斗争的悲剧，提不到路线之争，只是二虎相争，何况他们都说自己代表人民，百姓自然是乐得坐观成败。

八、文艺问题

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取得一些成绩是可喜的，但文艺作品在数量上少得可怜，群众性创作的春天还未到来，精神粮食的匮乏，是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严重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始根源，是我们的政治路线压制了群众的创作热情，对文学艺术的标准捉摸不透，生怕抓辫子，文化工作危险论，对搞文学创作的秀才们还是紧箍咒，肚里有货不敢出，生怕一言不当，误入雷区，成了“跳梁小丑”。

本来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广大作者对文艺方向创作方法有了新的认识，思想觉悟、精神境界有所提高，都想通过创作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我们的“样板戏”却以绝对权威的“板子”把他们打了个晕头转向，文艺作品完全变成了某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传声筒。在名曰“革命的浪漫主义”指导下，形成了一点也无“浪漫”可言的创作公式，作品内容成了大同小异的填词，阶级斗争是唯一主线，英雄人物“高大全”到常人不可理解的高度，所谓“三突出”模式，更是公然宣传英雄创造历史，老百姓只配跑龙套而已。

就以现在的样板戏、电影为例谈几点看法：

1. 理论上宣传的是为工农兵服务，但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形式，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样板戏一枝独秀，独霸舞台。

2. 恩格斯说“要善于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我们的高大全英雄们高得让群众难以相信，因为他既有高深的理论水平，又有现实的革命精神，既会关心群众又能及时发现敌情，还能不讲儿女私情，满台奔波叱咤风云，可惜的是群众看不出江水英和方海珍个性上有何不同。

《红灯记》改编自《革命自有后来人》，一家三代人各有个性特征，改成京剧尚有余韵。但其他几部“样板”则不尽如人意，除了豪言壮语，双目圆睁外，毫无个性。而他们所表达的思想境界，与自身所处历史环境又毫不相关。

阿庆嫂面临困境，双眉紧皱毫无对策，但一想起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如醍醐灌顶，变得大智大勇，对敌斗争无往不胜，如此表达对领袖的热爱之情，宣传毛

泽东思想威力无穷恰当吗？

作家胡万春的《特殊性格的人》就是在特殊个性上表现英雄人物形象的典型。毛主席都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我们塑造的英雄个个“高大全”，似神不像人，更不适合普通百姓的欣赏口味。因此我们希望那些开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的“红人”们，多少也食点人间烟火，写点人间的凡人小事，多塑造几个李向阳、王成式的英雄，少捏造几个柯湘、方海珍式的“假神”。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群众历来分为左中右，或曰先进中间落后三部分，作为文学作品必须全面反映这人间百态，既得有保尔·柯察金，也得写三仙姑、鲁达、孙悟空，才能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现在则成了一个英雄一个坏人，一群龙套走马灯。这能算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吗？

九、教育革命（未成文，略）

【编读往来】

齐晓筠谈 32 期徐友渔专辑

近年来，除了一两篇有关文革历史的访谈外，有好长时间没有读到徐友渔研究文革的文章了。这次从《昨天》32 期一下子读到徐友渔的多篇文革反思文章，十分高兴，推荐给一些朋友，也都说好。这些文章都不长，文字朴实，但讲的道理深刻，很有说服力。这样深入浅出的写法值得提倡。不足处是文中的一些重要引文没有注明出处。

从这个专辑可以看到，徐友渔既有亲历（而且是热情投入）文革的切身体验，又有对文革问题的长期思考，希望今后继续读到他更多的文革研究文章。